《當代史學》第 11 卷第 3 期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Review* **Vol. 11 No. 3**
2012 年 9 月（總第 43 期） September 2012

目 錄 Contents

❖ 香港史研究 ❖

香港「新語」——早期中英雙語辭典對近代中日兩國語文的影響 ..... 周佳榮 101
本土歷史的集體回憶——簡介香港十八區風物志 ..... 彭淑敏 107

❖ 婦女史研究 ❖

從五四時期婦女報刊看中國新女性形象的確立 ..... 周佳榮 116
2011 年出版中國婦女史著作八種介紹 ..... 丁 潔 128

❖ 書 評 ❖

李金強著《一生難忘——孫中山在香港的求學與革命》評介 ..... 文兆堅 133
王德昭著《孫中山政治思想研究》評介 ..... 文兆堅 137
王尊旺、李穎著《醫療、慈善與明清福建社會》評介 ..... 廖懷恩 143

❖ 學界動態 ❖

「辛亥革命百年：孫中山、近代中國與海外華人」
國際學術研討會紀要 ..... 區志堅 145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活動匯報（2011 年下半年至 2012 年上半年）..... 資料室 148
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活動匯報（2011 年下半年至
2012 年上半年）..... 資料室 150

本期封面：潮州湘子橋，照片由侯勵英博士提供。

《當代史學》第11卷第3期（2012年9月）

❖ 香港史研究 ❖

香港「新語」——早期中英雙語辭典對近代中日兩國語文的影響

周佳榮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

（一）引　言

十九世紀中葉開始，香港已成為亞洲地區最早發展新式教育的城市之一，西方書刊和外國新知不斷傳入，本地出版的報章、雜誌和各種圖書也逐漸蓬勃起來。自此，香港的華文出版一直擔當著獨特的角色，對書報印刷事業的現代化作出了重大貢獻。

論者已予指出，香港在中外交通方面「視內地之交溶感受為較早，故能以時放射，肇開風氣」。[1] 而於知識資訊的傳播流通，很多時更起著橋樑和中介作用。不但如此，香港還模鑄了一個中西文化匯薈的社會，東西方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又能各展所長，促進了華南地區以至廣州、上海等中國城市的文化活動，對鄰近國家如琉球、日本和東南亞地區，且產生了積極的影響。[2]

早期香港刊行的不同類型出版物之中，以報刊、專著、課本和字典較受重視。具體地說，1853 年 8 月香港英華書院創辦的《遐邇貫珍》（*Chinese Serials*），是鴉片戰爭後在華人社會出現的第一種中文報刊，曾受到日本幕末官員和有識之士如吉田松陰（1830–1859）等的注意。[3] 流亡香港的著名思想家王韜（1828–1897） 撰著的《普法戰紀》，是近代第一本中文的西洋史著作，此書傳到日本後引起很大反響。[4] 1874 年王韜在香港創辦《循環日報》，每日發表論說一篇，遂使該報成為近代中國最早的政論報紙，日本報人因而邀集王韜到東瀛訪問，為時

1　羅香林著《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香港：中國學社，1961 年），第一章〈導論〉。

2　關於香港早期書刊對琉球的影響，可參周佳榮〈十九世紀香港與琉球的文化關係〉，《香港浸會大學史學集刊》第 1 輯（香港：利文出版社，1999 年），頁 39–47；關於香港早期書刊對日本的影響，可參周佳榮〈十九世紀香港書刊在日本的傳播〉，《歷史與文化》第 2 卷（香港：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2001 年），頁 79–84。

3　參閱增田涉《西學東漸と中國事情》（東京：岩波書店，1979 年），頁 28。

4　參閱王曉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頁 215–216。

長達四個月，其間並且廣受文士學者和政壇人物的歡迎，在近代中日交流史上一時盛況空前。[5]

有趣的是，連西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1814–1897）編譯的中英雙語對照教科書《智環啟蒙塾課初步》（*A Circle of Knowledge*，香港：英華書院，1856 年初版，1864 年再版）也傳到日本，甚至在日本被多次重印、改編，還有日譯本、插圖本等。書中若干詞匯更被吸收到日文中去。[6]

至於工具書方面，羅布存德（William Lobscheid）編《英華字典》（*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於 1866 年至 1869 年出齊四冊，這套巨型的雙語辭書曾在日本得到極大推崇，論者更予指出，此書「對日本詞典中譯詞的最初形成起了決定性的作用。」[7] 可惜此書在香港幾乎不為人所知，在中國學界也鮮有人提及；日本學者確認有不少日本譯詞來自此字典，給予很高的肯定，這在日本語學界已成常識，但中國學者注意及此者仍然甚少。

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中國開始派遣學生到日本留學，其後蔚為風氣，在二十世紀初期已逾萬人。留日學生出版了不少書刊，把大量日語詞匯引介到中國內地，成為「漢語外來詞」，當中包括若干日本從香港書刊吸收過去的「香港新詞匯」。即是說，現代漢語中，有一些被認為是從日語引進的「漢語外來詞」，即「日本借詞」，其實源自香港出版的中文書刊，這些「香港新詞匯」是經日語轉介到漢語中去，造成類似「出口轉內銷」的情形。

「香港新詞匯」亦可稱為「香港新語」，「新語」在二十一世紀叫做「潮語」（意即流行語），換句話說，「香港新語」就是十九世紀的「香港潮語」。本文旨在說明上述這類詞匯為數甚多，初步統計不下二百個，在「漢語外來詞」中佔相當的比重，應該及早予以改正。與此同時，本文亦擬一再強調，香港早期書刊在近代中日交流史上，以及在現代日語、現代漢語的形成過程中，所起過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二）早期中英雙語辭典的編印情況

中英雙語字典的嚆矢，是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 年）編的《華英字典》。此書第一卷取名《字典》，1815 年在澳門印刷；第二卷取名《五車韻府》，於 1819 年至 1820 年間出版；第三卷取名《英漢字典》，1822 年印行。但因馬禮遜當時缺乏可以參照的材料，這套字典粗疏錯漏之處甚多，即使西方傳教士亦每以此為言，但馬禮遜字典開創的意義則毋容置疑。

中英《南京條約》簽訂後，香港在英國管治下逐漸發展起來，出版活動日趨頻繁，從 1843 年至 1860 年英法聯軍之役（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時止，傳教士在香港出版的中文書刊，據已知的統計達六十種之多。當中可注意的有兩事：其一，是英國倫敦會傳教士湛約翰（John Chalmers）編《英粵字典》，1859 年出版，雖然只是一本僅有一百六十一頁的袖珍手冊，畢竟為香港地區出版的第一種中英雙語工具書。湛約翰於 1852 年到香港，主持倫敦會香港分會事務，他在 1855 年編寫了一本只有三十三頁的小冊子《初學粵音切要》，以廣東話與英語對照，而用羅馬字注音。後來又在這個基礎上編成《英粵字典》（1872 年重印時改名《粵語袖珍字

5 參閱周佳榮〈在香港與王韜會面——中日兩國名士訪港記錄〉，林啟彥、黃文江主編《王韜與近代世界》（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0 年），頁 391。

6 周佳榮〈十九世紀香港書刊在日本的傳播〉，《歷史與文化》第 2 卷，頁 82。

7 參閱高野繁男著、于日平譯〈《英華字典》與英日譯書——中日英語詞典中譯詞的交流〉，王勇主編《中日漢籍交流史論》（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2 年），頁 395–398。

典》)，1859 年此書出版後他就移居廣州。其二，是上面提到的《英華字典》的編者羅布存德，1850 年代他在香港已出版了八種書籍，依次是：一、《異端總論》，1854 年福漢會出版（26 頁）；二、《福世津梁》，1854 年出版（18 頁）；三、《地理新志》，1855 年出版（19 頁）；四、《妙齡雙美》，1856 年出版（14 頁）；五、《千字文》，1857 年出版；六、《麥氏三字經》，1857 年出版（16 頁）；七、《幼學詩釋句》，1857 年出版（17 頁）；八、《四書俚語啟蒙》，1860 年（31 頁）。第一、二、四、六種是宗教書籍，第三種是地理書籍，第五、七、八種是教科書，於此可見羅布存德的志趣所在。[8]羅布傳德或作羅存德、羅傳列，是德國傳教士，於 1856 年來港，就香港政府之聘，任皇家書館監督。除中文書外，他還編撰了不少中英文雙語及英文著作，包括 1864 年出版的《漢語語法》，此書旨在幫助外籍學生講寫漢語。[9]

羅布存德編《英華字典》是一部逾二千頁的巨著，分為四冊，於 1866 年至 1869 年間出齊。時值日本明治維新初興，香港書刊自幕末以來已在日本社會上流傳，成為朝野上下了解國外情況和學習西方知識的一個媒介之一，語言工具書尤為日本洋學人士所重視。當時日本缺乏適合新時代需求的英日雙語書籍，羅布存德的《英華字典》無論在規模上和內容上，都大大超越馬禮遜的《英漢字典》，即使在 1870 年代以後三、四十年間，舉世亦無出其右，直至二十世紀初年始為其他中英雙語工具書所超越。

在日本，最早受羅布存德編《英華字典》一書影響的，是吉田賢輔編《英日字典》（1872 年出版），在很大程度上參考了羅布存德的字典，並改編成一種英日雙語工具書。中村校正，津田柳澤、大井譯《英華和譯字典》，是羅布存德《英華字典》的譯文版，於 1872 年開始著手，用了六年時間完成，1879 年出版，至 1884 年又出版《增訂英華字典》。除此之外，柴田、子安合著的《英和字匯》（1873 年出版），該書對此後的英日辭典影響極大，同時是受到羅布存德字典的啟發。[10]

羅布存德《英華字典》影響日本的途徑，除了直接、間接為日本的雙語辭典所吸收之外，另一個方式，是日本學者使用此字典從事翻譯工作。例如曾赴英國並受基督教影響的中村正直（1832–1891 年），他譯了英國森姆耳・史麥斯（Samuel Smiles）的《自助論》（*Self Help*），改題《西國立志編》，於 1871 年出版，在翻譯過程中就借助了羅布存德的字典。此書描述西方自古以來三百餘名立志成功的人物事跡，以動人的譯筆鼓吹自助精神，備受讀者歡迎，重版多次，對青年階層鼓舞極大，甚至給譽為「明治之聖經」。接著，中村正直又翻譯米勒（J. S. Mill）的《自由論》（*On Liberty*），題為《自由之理》於 1872 年出版。[11]

著名哲學家井上哲次郎（1855–1944 年）編的《哲學字彙》（1881 年出版），也吸納了羅布存德字典中的不少詞匯。[12] 井上哲次郎增補的《增訂英華字典》，1900 年由日本善鄰譯書館出版，匯合了羅布存德原書及日本增訂、修改的材料，可說是日本方面最後的集大成者，封面並請中國政界名人張之洞（1837–1909 年）題簽。不過，井上哲次郎亦因此書而受到一些批評，指他有抄襲之嫌，把眾人的成果轉換成為自己個人的成績。

順帶一提，羅布存德另於 1871 年出版《漢英字典》（*A Chi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

8　參閱熊月之著《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147–151。

9　參閱霍啟昌著《香港與近代中國》（香港：商務印書館，1992 年），頁 54–55。

10　參閱高野繁男前引文。

11　參閱周佳榮著《近代日本文化與思想》（香港：商務印書館，1985 年），頁 22–23。

12　參閱森岡健二《語彙の形成》（東京：明治書院，1987 年），頁 189–204。

他的詞典雙璧至此完成。英漢、漢英對照的雙語字詞工具書，可以說是由馬禮遜草創，而由羅布存德奠定的，此後中外都有專家學者予以繼承和擴展。不過，羅布存德的《漢英字典》僅一冊，只有《英華字典》四分之一的份量，對象主要是學習中文的西方人士，中國讀者當然亦可以借助這本字典學習英文，但此書似不曾為中國學者提及，也不為日本學者所注意，相對於他的《英華字典》顯然是較為遜色的。

（三）羅布存德《英華字典》的影響

羅布存德的《英華字典》出版後，究有多少冊原本傳到日本，已難考究，相傳為數不會很多。但字典中率先使用的一些詞匯，最常見的如「銀行」、「保險」等，早已成為日文使用，以至現在。據說日本首相伊藤博文（1841–1909 年）創立日本銀行之際，一時想不通英文的 bank 在日文應該怎樣譯過來，於是拿了羅布存德的《英華字典》翻檢，看到 bank 譯為錢莊、銀鋪、銀行，他覺得錢莊和銀鋪不夠大體，於是採用了「銀行」一詞，日本帝國銀行就這樣成立起來了。不過現代日語詞匯之中，究有多少個詞匯採錄自羅布存德的字典，沒有人作過全面的統計，按已知的論證推算，相信數百個以上是可以肯定的。

西方學者的著作認為，研究現代漢語詞匯的一些學者，通常一味強調「那些進入漢語的日語新詞，他們以為是借自日語的。而事實是，這類詞匯中有好多是由中國傳至日本的，幾十年後才又回到了中國。」[13] 此說甚是，但西方學者在探討漢語對日語詞匯的影響時，並沒有留意到上述香港出版的書刊，包括羅布存德的《英華字典》在內。至於另一個問題，即漢語中的日語借詞，西方學者以及中、日兩國的學者，都沒有注意「香港詞匯」被當成日語借詞所產生的謬誤。

實藤惠秀著《中國人日本留學史》於 1960 年出版，1970 年出增補版，是研究中國留日學生問題的開山著作，廣為通曉日文的中國學者所閱讀和引用。此書第七章專論現代漢語與日語詞匯的攝取，並列出「中國人承認自來日語的現代漢語詞匯一覽表」，總共有八百六十九個詞匯。[14] 但翻檢羅布存德的《英華字典》，至少可以找到當中的一百六十六個詞匯（表 1）。

表 1　始見於《英華字典》的現代漢語詞匯（頁碼）

1.　入口（996）	2.　～力（731）	3.　三角（1824）	4.　上水道（1913）
5.　下水道（1913）	6.　工業（89）	7.　工藝美術（89）	8.　反映（1449）
9.　反射（1449）	10. 反動（1491）	11. 反應（1480）	12. 方法（1958）
13. 方面（792）	14. 文法（1312）	15. 文明（987）	16. 文學（1119）
17. 支部（1286）	18. 分子（1282）	19. 分類表（397）	20. 手段（1825）
21. 予約/預約（1356）	22. ～化（1022）	23. 反～（64）	24. 主權（1640）
25. 生理（281）	26. 生產（1377）	27. 代理（1747）	28. 代數（補遺）
29. 民法（1092）	30. 目的（1241）	31. 必要（393）	32. 必然（349）
33. 由於（1375）	34. 古典（417）	35. 石油（1210）	36. 右翼（1987）

13 〔意〕馬西尼（Federico Masini）著、黃河清譯《現代漢語詞匯的形成——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語研究》（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7 年），頁 98。

14 實藤惠秀著《中國人日本留學史》，由譚汝謙、林啟彥譯成中文，改名《中國人留學日本史》，1982 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次年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簡體字版。

37. 左翼（1987）	38. 交易（1810）	39. 交流（1179）	40. 交通（1811）
41. 交換（766）	42. 交際（496）	43. 自由（870）	44. 自治（910）
45. 自然（945）	46. 地主（1088）	47. 同盟（462）	48. 刑法（1092）
49. 吋（1004）	50. 米（1175）	51. 作用（1902）	52. 投票（132）
53. 投機（960）	54. 判斷（25）	55. 身分（1610）	56. 克服（1701）
57. 住所（1124）	58. 材料（1157）	59. 希望（967）	60. 法式（1644）
61. 法定（1100）	62. 法則（1290）	63. 法律（307）	64. 金庫（1921）
65. 物質（751）	66. 批判（1917）	67. 批評（1493）	68. 服從（1832）
69. 命令（361）	70. 使用價值（73, 1367）	71. 制裁（1456）	72. 定額（1231）
73. 典型（1352）	74. 供給（1394）	75. 知識（1022）	76. 事變（1789）
77. ～法（1173）	78. 保障（142）	79. 保險（1563）	80. 保釋（1141）
81. 侵犯（38）	82. 侵害（1025）	83. 故意（500）	84. 思想（476）
85. 便所（1955）	86. 活動（258）	87. 相對（792）	88. 規範（627）
89. ～界（24）	90. 消化（1632）	91. 消毒（515）	92. 特權（1360）
93. 原理（1371）	94. 流行（1382）	95. 通名（60）	96. 通理（1548）
97. 展開（1655）	98. 時間（1039）	99. 記錄（1748）	100.記憶（177）
101.條件（334）	102.真理（1834）	103.氣體（481）	104.根本的（1420）
105.理性（1348）	106.理事（1814）	107.理論（781）	108.進步（1674）
109.基地（144）	110.間諜（1550）	111.教育（1812）	112.偵探（1550）
113.停止（342）	114.接近（408）	115.偏見（1061）	116.偶然（355）
117.陰極（1336）	118.牽引車（1399, 1971）	119.勞動（1831）	120.勞動者（1831）
121.單位（1874）	122.寒帶（2013）	123.換位（1819）	124.運動（政治）（1840）
125.博士（1097）	126.散文（1390）	127.報告（1470）	128.登記（1579）
129.陽極（1336）	130.電報（1759）	131.傳票（1715）	132.傳播（1376）
133.傳染病（437）	134.經理（1362）	135.幹事（1814）	136.農民（40）
137.新聞（872）	138.新聞記者（872, 1441）	139.階級（1674）	140.鉛筆（1095）
141.想像（987）	142.對稱（516）	143.演習（1350）	144.管理（1814）
145.說明（1239）	146.數學（83）	147.旗手（737）	148.銀行（135）
149.實體（1631）	150.調整（1837）	151.確定（417）	152.衛生（1392）
153.課程（1697）	154.熱帶（2013）	155.學士（666）	156.機會（792）
157.機關（1561）	158.諷刺（1335）	159.還元(原)（1485）	160.~學（1097）
161.總計（1325）	162.總理（1031）	163.斷交（243）	164.關係（705）
165.醫學（1164）	166.瀝青（1320）		

【說明】以上詞匯被誤認為是從日語引進的「漢語外來詞」或「日語借詞」，其實最早是在香港編印的中英雙語辭典出現。

（四）香港書刊及新詞匯的傳播

總括來說，見於《英華字典》的現代漢語詞匯，至少有一百六十六個被誤以為是從日語引進的「漢語外來詞」。另外，從香港早期出版的書刊中，包括《遐邇貫珍》、《智環啟蒙塾課初步》和譚達軒編《華英字典彙集》（1875 年）等，實藤惠秀開列的詞匯之中，始見於這些書刊的詞匯有三十多個（表 2），合計在二百個以上。

表 2　始見於香港出版其他書刊的現代漢語詞匯

香港出版書刊	漢語詞匯
《遐邇貫珍》（1853–1856）	1. 分析 2. 交涉 3. 地質 4. 判決 5. 言語學 6. 物理 7. 注射 8. 具體 9. 派遣 10. 差等 11. 建築 12. 游擊 13. 意圖 14. 會計 15. 資本 16. 管制 17. 選舉 18. 積分 19. 職員
《智環啟蒙塾課初步》（1856）	1. 出口 2. 市場 3. 政治 4. 教授 5. 蒸氣 6. 數量 7. 構造 8. 機械
《華英字典彙集》（1875）	1. 化學 2. 主席 3. 主筆 4. 生物學 5. 成為 6. 倉庫 7. 電力 8. 試驗 9. 關於 10. 藝術

【說明】以上詞匯被誤認為是從日語引進的「漢語外來詞」或「日語借詞」，其實最早是在香港編印的書刊中出現。

換言之，上述二百多個「香港詞匯」，其實就是近代中國較早形成的一批現代漢語詞匯，當中有不少被日本人借用到日文中去，而成為現代日語的漢語外來語，而被誤以為是日語詞匯。中國學者不察，襲取實藤惠秀等人的不當說法，或據以撰寫專著論文，或據以編成正式的工具書。[15] 其說沿用至今已數十年，中國學者似無異議，持懷疑態度的也罕見，在二十一世紀今天應該是加以糾正的時候了。

在結束本文之前，尚有兩事需予補充：其一，是太平天國干王洪仁玕（1822–1864 年） 曾避地香港，廣泛閱讀香港書刊，後來在天京（今南京）著成《資政新篇》，「銀行」、「保險」等新詞匯都可見於該書之中。即是說，洪仁玕已將這些「香港詞匯」用於其著作，但太平天國官書在清朝是禁書，太平天國滅亡後更無從流通，《資政新篇》因而對現代漢語詞匯的形成不曾起過作用。其二，是 1908 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顏惠慶主編的《英華大辭典》，亦在相當程度上參考了羅布存德的《英華字典》，知之者甚尠，附記於此。

15　前者如高名凱、王立達撰寫的多篇學術論文，後者如劉正埮、高名凱、麥永乾、史有為編《漢語外來語詞典》（香港：商務印書館，1985 年）。

《當代史學》第11卷第3期（2012年9月）

❖ 香港史研究 ❖

本土歷史的集體回憶
——簡介香港十八區風物志

彭淑敏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

引　言

香港十八區區議會多年來均致力出版本區的風物志，把不同區域的別致風貌有系統地展現出來，精煉扼要地敘述本區的古今歷史、人物掌故、歷史建築、名勝古蹟、經濟發展、古村源流、城市建設、水陸交通、社會團體、文化習俗與逸事傳聞等，可謂包羅萬有，反映香港社會各區的歷史變遷，突出中外薈萃的特色。香港風物志除了可以成為遊覽該區的指南外，亦有助瞭解香港豐富的文化遺產，是本土獨有的集體回憶，產生無可估計的凝聚力，史料價值也不容忽視。今年 2011 年適逢是香港地區風物志出版的第二十年，[1] 而筆者也曾參與風物志的籌備和寫作工作，故撰文分享十八區風物志的主要內容，以供讀者參考。

香港島

■ 中西區

〔1〕梁炳華主編：《香港中西區風物志》，香港：中西區區議會，2011 年修訂版。（400 頁）

中西區位於香港島的西北部，範圍包括西環、上環、中環、金鐘、西營盤、石塘咀、堅尼地城和摩星嶺等，是香港開埠後最早發展的地區。[2] 此書以該區議會於 1998 年出版的《香港中西區風物志》及 1999 年的增訂版為藍本，是現時補注增訂的最新版本，也是十八區當中最新出版的風物志。全書分為十個部分，第一部分〈中西區簡史〉；第二部分〈分區簡介及地方名字的由來〉；第三部分〈滄海桑田——海岸線的變化〉，略述區內著名風光和該區與辛亥革命的歷史；第四部分〈歷史建築與機構〉，政府方面分為法、政機構、與軍事有關的建築物、民用建築物；宗教方面分為外國信仰、中國信仰；教育方面分為香港大學、中學與幼稚園；醫療方面分為醫院與精神病院，也討論特首施政報告之「保育中環」的構思；第五部分〈歷史悠久之商業機構〉，介紹銀行與金融業、西方商業機構和華資商業機構；第六部分〈運輸機

1　荃灣區議會：《荃灣二百年——歷史文化》（香港：該會，1991）。

2　中西區議會地區摘要，參閱 http://www.districtcouncils.gov.hk/central/chinese/welcome.htm，擷取日期：2011 年 8 月 1 日。

構、公園與名勝和碑石〉；第七部分〈與港督名字有關的街道〉；第八部分〈社會組織與街坊會〉，包括西方組織、香港華人社團、香港同鄉會和商會組織和中西區街坊會；第九部分〈祭祀與風俗〉；以及第十部分〈湮沒風貌〉。書末附有中西區歷史文化之旅路線圖，分別是中區線、西區線、山頂區及孫中山史蹟徑。

■ **灣仔區**

〔2〕灣仔區議會：《灣仔區古蹟與掌故》，香港：該會，1992。（64 頁）

灣仔區位於香港島北岸中央位置，範圍包括渣甸山、大坑、銅鑼灣、樂活、跑馬地、鵝頸、愛群、軒尼詩、修頓、大佛口和司徒拔道。[3] 本書是該區議會較早出版的刊物，嚴格來說不同一般區議會出版的風物志。出版規模雖然較少，仍以中英文撰寫，也收入不少古今照片。主要內容包括〈歷史概況〉、〈灣仔政務處及區議會〉、〈古蹟及歷史建築物〉、〈湮沒的風貌〉和〈傳統節日及掌故〉。此外，可參考何佩犀編：《灣仔千禧年特刊》（香港：灣仔區迎千禧活動工作委員會，2000），書中的〈灣仔回顧〉（頁 53–78）可提供多一些該區相關資料，如〈滄海桑田〉一節中談及關於灣仔海岸線的變遷，在〈失落地標〉中簡述春園、摩理臣山、鵝澗榕蔭、黃泥涌村和東角銅鑼的歷史片段，〈歲月風情〉一節內也收集了不少珍貴的舊照片，並附有介紹文字，以及在〈世紀見證〉一節中補充關於香港賽馬會、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保良局和怡和午砲的史事。

■ **南區**

〔3〕南區區議會：《南區風物志》（2009 新修版），香港：該會，2009。（178 頁）

南區位於香港島南部，東起大浪灣，西迄薄扶林，包括石澳、大潭、赤柱、舂坎角、淺水灣、黃竹坑、香港仔和鴨脷洲等（頁 8）。本書按梁炳華於 1996 年撰寫的《南區風物志》為藍本，全書共有五章，第一章〈南區歷史篇〉，闡述南區和分區簡史，計有（一）薄扶林、華富及華貴區；（二）香港仔、田灣、石排灣及置富區；（三）鴨脷洲區；（四）黃竹坑及赤柱區。在社區變遷的歷史中，突出了漁業的盛衰變化和古村源流與發展；第二章〈歷史名勝篇〉，分為政府建築、民用建築、教育機構、宗教信仰、名勝、水塘與文物，其他包括石碑、石刻和考古遺址，強調了歷史意義的重要；第三章〈自然風光篇〉，介紹南區八景，分別是赤柱朝曦、鴨洲帆影、扶林曲徑、浪灣水軟、石排煙雨、淺水丹花、石澳風濤及鰲洋甘瀑；第四章〈傳統習俗篇〉，簡介簿扶林村舞火龍、盂蘭勝會、香港仔及赤柱龍舟競渡；第五章〈訪古旅遊篇〉，突顯該區古蹟旅遊的價值。

■ **東區**

〔4〕郭少棠主編：《東區風物志：集體記憶社區情》，香港：東區區議會，2003。（190 頁）

東區位於香港島東北部，範圍包括銅鑼灣避風塘、維多利亞公園、北角、鰂魚涌、筲箕灣、柴灣及小西灣等。[4] 本書共八篇，第一篇〈東區舊事好記憶——東區社區發展史〉，反映

---

3 楊穎賢：《文化・地方・人情：灣仔風物誌》（香港：香港小童群益會，2010），頁 12。此書是現時香港地區風物志中少有不是由本區區議會出版的專著。

4 東區區議會地區摘要，參閱 http://www.districtcouncils.gov.hk/east/chinese/welcome.htm，擷取日期：2011 年 8 月 1 日。

了該區多姿多采的地方情懷；第二篇〈工商百業齊奮進——工商業發展篇〉，介紹糖廠、船塢、餅乾廠、發電廠、樹膠廠、影畫片公司、漆油公司、書館、製罐廠、石印局和魚類批發市場。第三篇〈社團互助動區情——社會服務團體篇〉，分別介紹街坊組織、中、小學教育事業、天主教、基督教等教育團體。第四篇〈集體記憶懷古蹟——歷史名勝篇〉，分別為政府、軍事、民間和宗教建築等三十九項，被譽為重要的社區文化資源。第五編〈風俗民生情暢旺——民生風俗篇〉，包括習俗傳統、公共交通、東區飲食業發展和消閒娛樂。第六篇〈舊街舊事見區情——街名典故篇〉，回顧三十項道路的命名和歷史發展。第七篇〈舊事如夢顯真情——風物掌故篇〉，闡述一些著名地標的傳聞和傳說。第八篇〈文化足跡尋路線——文化旅遊篇〉，介紹區內博物館和文化旅遊路線。書末附有該區歷史大事記（1843–1960），以供參考。

九龍半島

■ 油尖旺區

〔5〕蕭國健主編：《油尖旺區風物志》（第三版），香港：油尖旺區議會，2003。（176 頁）

油尖旺區位於九龍半島西南部，是油麻地、尖沙咀和旺角的合稱。[5] 本書按 1999 年及 2000 年出版的《油尖旺區風物志》為藍本，全書共九篇，第一篇〈政府建築〉，介紹舊水警大樓、舊軍營、炮台、訊號塔、天文台、警署、舊消防局、舊抽水站裁判署和舊政府船塢；第二篇〈民間建築〉，簡介醫院、公園、酒店、滾球會、木球會和唐樓的歷史面貌；第三篇〈社會服務團體〉，包括基督教青年會、童軍總會、救世軍、保護兒童會和街坊福利會；第四篇〈學校〉，簡述該區的小學、中學和大學教育狀況；第五篇〈宗教建築〉，闡述華人廟宇、天主教堂、基督教會和回教寺的宗教生活；第六篇〈交通〉，分別介紹舊火車站、鐘樓、天星小輪和油麻地小輪；第七篇〈歷史文物〉，回顧 1941 年前華文碑記、鐘鼎文物和古炮的史事；第八篇〈街名典故〉和第九篇〈社會民生〉，反映該區民生風俗與歷史發展。書末附錄油尖旺區百年大事記（1860–1970）、尖沙咀與官涌的歷史事件及訪古遊路線。

■ 觀塘區

〔6〕梁炳華編著：《觀塘風物志》，香港：觀塘區議會，2008。（186 頁）

觀塘區是九龍最東的一個分區，西接啟德機場跑道以北的海岸，東以飛鵝嶺山麓為界，南抵鯉魚門（頁 13）。本書共二十章，第一章和第二章是〈題辭〉和〈獻辭、序、前言〉；第三章〈觀塘簡史〉，介紹傳統行業、日佔時期、填海工程、工業、教育、交通發展及衛星城市；第四章〈地方名字由來〉，敘述觀塘、藍田、秀茂坪、牛頭角、魔鬼山、茶果嶺和鯉魚門的命名；第五章〈日佔時期的觀塘〉；第六章〈歷史建築〉，簡介炮台、前皇家空軍基地、公園和廟宇；第七章〈傳統風俗節慶〉，略述天后誕、盂蘭勝會、齊天大聖誕和龍舟競渡；第八章〈有關觀塘的歷代詩文〉；第九章〈社區發展〉，回顧裕民坊、牛頭角、茜草灣、茶果嶺和鯉魚門的發展；第十章〈房屋發展〉，簡介木屋區、廉租屋、徙置區及臨時安置區、公共屋邨的歷史面貌；第十一章〈經濟民生：已消失之傳統行業及工業發展〉，包括鹽業、打石業、造船業和服務業等；第十二章〈消閒生活〉；第十三章〈民間組織與機構〉，介紹包括民聯會、學校、醫院、遊樂社、游泳會、教會、體育會和工商業聯合會；第十四章〈填海史話——地貌、海

5 油尖旺區議會網站http://ytmdc.hk/index/index2d30-2.html，擷取日期：2011 年 8 月 1 日。

岸綫之改變〉；第十五章〈掌故〉，回顧靈龜、天后、鯉魚嬉水、礁石、許願樹、求子石、飛龍等傳說和傳奇人物的事跡；第十六章〈人物憶昔〉，專訪十七位各行各業社區人物；第十七章至二十章分別為〈考察路線〉、〈參考書目〉、〈鳴謝〉和〈觀塘分區地圖〉。

■ 黃大仙區

〔7〕游子安主編，張瑞威、卜永堅編撰：《黃大仙區風物志》，香港：黃大仙區議會，2003。（233 頁）

黃大仙區位於九龍半島東北，北依獅子山、大老山、慈雲山，東臨飛鵝山，是十八區中唯一沒有海岸線的行政區（頁 15）。本書共八章，第一章〈建置沿革篇〉，敘述該區於明清時期、港英時期（1842–1941）、日佔時期（1941–1945）、港英時期（1945–1997）及回歸之後（1997–）的歷史演變；第二章〈社區發展篇〉，分別以古舊村落、舊村消逝、公屋湧現、學校教育、社區服務、醫療、護老服務等進行介紹；第三章〈經濟民生篇〉，經濟活動方面包括農業、採石、工業和電影製作，民生狀況方面包括交通、香燭舖與解簽檔、遊樂場和戲院；第四章〈古蹟名勝篇〉，敘述十三項道、佛建築和廟宇、安老院的歷史沿革與建築特色；第五章〈信仰風俗篇〉，介紹包括頭炷香、天公誕、天忌、三山國王誕、天后誕、福德誕、侯王誕、盂蘭勝會、黃大仙誕和七約太平清醮等神誕節慶，反映該區濃厚的宗教活動特色；第六章〈雜纂逸聞篇〉，介紹區內獨特的事蹟和傳說；第七章〈詩詞碑刻篇〉；第八章〈附錄〉，收入該區建置沿革大事年表、訪古遊路線圖、嗇色園黃大仙祠平面圖及志蓮淨苑殿堂配置圖。

■ 九龍城區

〔8〕劉潤和主編：《九龍城區風物志》，香港：九龍城區議會，2005。（184 頁）

九龍城區位於九龍半島中部，東以聯合道、太子道東為界、西以港鐵東鐵綫為界。[6] 本書共四部分，第一部分是九龍城區的歷史及其意義，包括第一章〈九龍城自南宋至英佔前的歷史風貌〉；第二章〈九龍城寨在中英港現代史上的意義〉；第三章〈九龍城區漁農及石礦業的發展與沒落〉；第四章〈九龍城區城市化及其工業發展的軌跡〉；第五章〈樂善堂的建立及其貢獻〉；第六章〈啟德機場的發展與香港經濟成長的面貌〉和第七章〈賞拾九龍城區的文教風韻〉。第二部分是九龍城區名勝古蹟巡禮，包括第一章〈九龍司衙門與九龍寨城公園〉；第二章〈宋皇臺公園〉；第三章〈宗教建築〉；第四章〈軍事遺蹟〉；第五章〈特色民居〉和第六章〈其他〉。第三部分是九龍城區傳統習俗，共有五章，包括〈觀音開庫〉、〈天后寶誕〉、〈福德寶誕〉、〈紅磡街市觀音誕花炮會〉和〈盂蘭節〉。第四部分九龍城區的〈民俗詩詞〉與〈相關文字〉，以詩詞韻文和碑銘文字回顧該區的歷史發展。

■ 深水埗區

〔9〕深水埗區議會：《從深水步到深水埗》（第三版），香港：該會，2003。（68 頁）

深水埗區位於九龍半島西北部，北接獅子山郊野公園，東以港鐵東鐵線為界，南抵界限

6 九龍城區議會地區摘要，參閱 http://www.districtcouncils.gov.hk/klc/chinese/welcome.htm，擷取日期：2011 年 8 月 1 日。

街，西至海旁，包括昂船洲。[7] 本書主要內容分為〈歷史概述〉、〈房屋〉、〈工商業〉、〈歷史建築與城市發展〉、〈地區組織〉及〈教育與閑餘〉。略述深水埗從古代至清朝、抗戰前後及五、六十年代的民生概況。還把該區稱為「香港房屋的展覽館」，介紹石硤尾邨、大坑東邨、李鄭屋邨、大坑西邨、美孚新邨、又一村、衛民邨、蘇屋邨、朱古仔村和白田等各式各樣的房屋。回顧戰前長沙灣的造船業、五、六十年代的布匹業、鴨寮街的電子器材、花墟的農牧業、長沙灣的屠房、副食品批發業、北河街街市和深水埔碼頭、電腦器材零售業和長沙灣工業大廈等。書內提供過百幀黑白懷舊照片，彌足珍貴。

新界

■ 荃灣區

〔10〕荃灣區議會：《荃灣二百年－－歷史文化》，香港：該會，1991。（54 頁）

荃灣區位於新界的南部，本書共十三章，分別是（一）〈前言〉、（二）〈宗族鄉村的成立及人口的遷移與增加〉、（三）〈經濟和工商業〉、（四）〈教育〉、（五）〈警政〉、（六）〈政治〉、（七）〈醫療〉、（八）〈宗教〉、（九）〈交通〉、（十）〈文娛康樂〉、（十一）〈名勝風景〉、（十二）〈青衣〉及（十三）〈馬灣〉。本書出版較早，內容精簡，仍能圖文並茂。書末附錄對荃灣有特殊貢獻名人傳略，計有楊國瑞、陳永安、何傳耀、葉德範和張煥廷。

■ 葵青區

〔11〕葵青區議會：《葵青－－舊貌新顏．傳承與突破》，香港：該會，2004。（189 頁）

葵青區位於新界的西南部，由葵涌區和青衣島組成。本書共八章，第一章〈探本尋源話葵青〉，講述該區的地名由來及傳統文化源流。第二章〈地方行政十八年〉，簡介該區區議會的由來及發展、地區分界、社區組織巡禮、健康城市及安全社區。第三章〈交通基建齊發展〉，回顧橋繫葵青、交通樞紐的發展和葵涌貨櫃港。第四章〈社區設施盡完善〉，講述學校發展、文康活動、社區設施、醫療服務和葵青劇院。第五章〈房屋發展說當初〉，介紹包括新市鎮發展藍圖、青衣艇戶的徙置過程、客家村落的重建及居住的狀況等。第六章〈旅遊蓬勃百業興〉，談及荔園與廟宇的史跡。第七章〈商機處處顯新姿〉，回顧傳統鄉村經濟生活、早期工業、青衣舊墟，也講述輕工業、重工業與區內的商機等。第八章〈雜纂軼聞知多少〉，有助增加對該區的認識，饒有興味。

■ 沙田區

〔12〕蕭國健主編：《沙田古今風貌》，香港：沙田區議會，1997。（128 頁）

沙田區位於新界的東部，範圍包括大圍、火炭、禾輋、石門、小瀝源、圓洲角、九肚山及馬料水，以及馬鞍山和烏溪沙。[8] 本書共七章，第一章〈歷史掌故〉，講述該區名稱的由來，以及介紹瀝源邨、望夫石、曾大屋、大圍、林村、馬鞍山、黃坭頭村、插桅杆村、大水坑村、多石村、烏溪沙、落路下、田心、香粉寮和小瀝源等地的相關歷史。第二章〈山川人物〉，介

---

7 深水埗區議會地區摘要，參閱 http://www.districtcouncils.gov.hk/ssp/chinese/welcome.htm，擷取日期：2011 年 8 月 1 日。

8 沙田區議會地區摘要，參閱 http://www.districtcouncils.gov.hk/st/chinese/welcome.htm，擷取日期：2011 年 8 月 1 日。

紹獅子山與九龍的名稱由來、城門河、馬騮山、九肚村和沙田中央公園。第三章〈鄉村源流〉，回顧該區墟市、早期對外的交通、沙田圍、牛皮沙、田心村及三十鄉村的發展事跡。第四章〈方物與飲食文化〉，以香樹、馬鞍山三寶、大藍樹、花卉、山水豆腐和乳鴿為題，加以介紹。第五章〈宗教〉，談及包括西林寺、車公廟、道風山基督教叢林、萬佛寺和道榮園。第六章〈傳統文化與風俗〉，介紹區內的太平清醮、香港中文大學、教育概況與馬場等事跡。第七章〈歷史事件〉，回顧客家人的遷移和遷海事件，以及香港淪陷時期的游擊隊等。

〔13〕區志堅主編：《馬鞍山風物誌：礦業興衰》，香港：沙田區議會，2002。（95 頁）

本書是沙田區議會出版的第一本馬鞍山風物志，全書共五章，第一章〈馬鞍山古蹟風貌〉；第二章〈馬鞍山開礦事業〉，敘述區內鐵礦來源、種類、礦業的運作和礦業興衰史；第三章〈馬鞍山礦工生活〉，包括礦工生活、醫療設備、人口分佈、日常娛樂和教育情況等；第四章〈天主教聖方濟會對馬鞍山礦工的慈惠事業〉，回顧聖方濟會神父及修女的活動，教會事業的蓬勃發展、教友的生活和事工活動；第五章〈基督教信義會對馬鞍山礦工的慈惠事業〉，簡述傳教工作、社會救濟服務和教育工作。

〔14〕沙田區議會：《馬鞍山風物誌：鞍山歲月》，香港：該會，2003。（150 頁）

本書是沙田區議會出版的第二本馬鞍山風物志，全書共四部分，第一部分〈當年情〉，回顧古舊的礦場、礦場的炮王、工程師和交通車等辛酸事跡；第二部分〈別有洞天〉，講述馬鞍山礦區地質與礦山開採；第三部分〈鞍山天與地〉，談及該區的海陸變遷、考古收穫、植物和古建築；第四部分〈馬鞍山三寶〉，簡介包括礦石、杜鵑和黃麞。

■ 屯門區

〔15〕劉智鵬編著：《屯門風物志》，香港：屯門區議會，2003。（192 頁）

屯門區位於新界的西北部，西倚青山山脈，東靠大欖山麓，北臨后海灣畔。[9] 本書共五章，第一章〈歷史〉，概述該區的歷史和大事記；第二章〈自然地理〉，簡介地形海域和自然風景，包括山脈、平地、河溪、海域、麥理浩徑、屯門徑、屯門——稔灣、龍鼓灘——湧浪——稔灣、新舊咖啡灣、嘉道理灣、黃金泳灘、青山灣、蝴蝶灣、蝴蝶谷和龍鼓洲——沙洲等；第三章〈文物勝蹟〉，包括考古文物與十八項名勝古蹟的介紹；第四章〈城鄉建設〉，回顧圍村的舊貌與發展、傳統生產方式與生產工具、圍村的建築、漁港和新市鎮的發展；第五章〈民情風俗〉，述說鄉事組織、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書中的〈歲月留情〉（頁 6–32）和〈昔日今朝〉（頁 139–179），提供不少古今照片，也附有該區名勝古蹟分佈圖、鄉村分佈圖和旅遊景點圖。

■ 大埔區

〔16〕蕭國健主編：《大埔風物志—— 2007 增訂版》，香港：大埔區議會，2007。（176 頁）

大埔區位於新界的東部，由大埔及西貢北兩個分區組成。本書以該區議會於 1999 年編印的《大埔風物志》為藍本，增補不少圖文資料。全書共九章，第一章〈歷史沿革〉，敘述該區從史前時代至現代的歷史事跡；第二章〈經濟狀況〉，簡介包括種茶、採珠、種香、燒灰、陶

9 屯門區議會地區摘要，參閱 http://www.districtcouncils.gov.hk/tm/chinese/welcome.htm，擷取日期：2011 年 8 月 1 日。

瓷生產、採船、漁業和農業等；第三章〈交通狀況〉，回顧海港（大步海、塔門港）、水路交通（烏溪沙渡、瀝源渡、大埔滘碼頭）、鐵路交通（大埔站、大埔墟火車站）和古道（觀音逕、大步逕、城門坳、往沙田區、往粉嶺馬尾下、汀角及船灣一帶往沙頭角、西貢北約往企嶺下）的發展史；第四章〈社會概況〉，介紹鄉約（大埔七約、聯益鄉、六鄉新村、西貢北約、十四鄉）、社會團體（七約鄉公所、大埔鄉事委員會、大埔商會、西貢北約鄉事委員會、大埔青年會、嘉道理農業輔助會）和民居；第五章〈前期教育及鄉村學校〉，包括早期教育、大埔官立漢文師範學校、一九四五年後的大埔鄉村學校、聖基道兒童院和松嶺兒童院；第六章〈古蹟文物〉，簡述公共建築、寺觀、廟宇、教堂教會、祠堂、橋樑井泉和碑銘；第七章〈風俗與慶典〉，分別以節、誕、醮為題；第八章〈歷史事件〉，回顧十二項與該區相關的史事和人物，如 1899 年英人接收新界、抗日紀事、李福林與康樂園，以及余東旋與余園等；第九章〈歷史地圖〉，收入明、清、民國和 1971 年等相關地圖；書末附有〈訪古遊路線〉和〈湮沒的古蹟〉等補充資料。

■ 北區

〔17〕北區區議會：《北區風物志》，香港：該會，1994。（160 頁）

北區是香港最北的區域，由上水、粉嶺、沙頭角和打鼓嶺四個分區組成，也是香港唯一陸地連接深圳市的行政區。[10] 本書是十八區中較早出版的風物志之一，主要內容包括〈北區簡史〉，介紹地域沿革、遷界與復界、分區概況、圍村與祖祠、信仰與祭祀及科學與學塾等；〈主要氏族及圍村〉，敘述四分區名字由來，包括上水、粉嶺、沙頭角和打鼓嶺，也述及主要氏族的拓殖史，分別是粉嶺龍躍頭鄧族、上水侯族、粉嶺彭族、上水廖族、沙頭角禾坑李族、打鼓嶺坪洋村陳族、沙頭角十約和打鼓嶺六約等圍村特色；〈歷史建築及名勝古蹟〉，包括上水萬石堂、顯承堂、明德堂、居石侯公祠、洪聖古廟、松柏塱客家圍、報德祠、茶桶耳古屋和石湖墟，粉嶺彭氏宗祠、思德書室、三聖宮、松嶺鄧公祠、善述書室、天后宮、觀龍圍、洪聖宮、崇謙堂、龍山寺、軒轅祖祠、蓬瀛僊館及聯和墟，沙頭角鏡蓉書屋、靜觀家塾、協天宮及鶴山寺、中英街、沙頭角鐵路隧道、天后宮、吉澳天后宮、吉澳水月宮及東和墟，打鼓嶺平源天后古廟、昇平社義祠、永傑書室、香園村炮樓、長山古寺、打鼓嶺警署和雲泉僊館，資料十分豐富；亦設專章介紹區內的〈歷史文物與農具〉和〈神誕、祭祀與風俗〉，書末附有〈北區訪古一日遊〉及〈北區名勝古蹟分佈圖〉。

■ 元朗區

〔18〕馮志明著，冼玉儀編：《元朗文物古蹟概覽》，香港：元朗區議會，1996。（136 頁）

元朗區位於新界的西北部，範圍包括屏山鄉、廈村鄉、錦田鄉、八鄉、新田鄉、十八鄉、元朗市及天水圍。[11] 本書以中英文對照撰寫，主要內容包括〈歷史概述〉，簡介元朗於一八九八年之前、英國租借新界初期、二十世紀上半期、日治時期和二次大戰到今天的發展歷史；〈各鄉歷史溯源〉，敘述錦田、屏山、廈村、新田、十八鄉和八鄉的獨特面貌；〈墟市之發展〉，簡

10 北區議會地區摘要，參閱 http://www.districtcouncils.gov.hk/north/chinese/welcome.htm，擷取日期：2011 年 8 月 1 日。

11 元朗區議會地區摘要，參閱 http://www.districtcouncils.gov.hk/yl/chinese/welcome.htm，擷取日期：2011 年 8 月 1 日。

述舊墟之創立、墟內之組織、五合街新墟、新墟之發展和戰後之演變；〈圍村之形成〉，介紹包括吉慶圍、泰康圍、永隆圍、上璋圍、灰沙圍、橋頭圍、輞井圍、沙江圍、祥降圍、錫降圍、仁壽圍、東鎮圍、石湖圍、新圍、南邊圍、西邊圍、水蕉老圍、英龍圍和大圍等十九條圍村；〈農村風貌〉，回顧殖蠔業、養魚業和白米種植的光輝歲月；〈文物古蹟〉，介紹包括位於錦田的清樂鄧公祠、鎮銳鋗鄧公祠、來成堂、留耕堂和長春園、泝流園、周王二公書院、二帝書院、洪聖宮、天后古廟、便母橋和錦田樹屋，位於屏山的鄧氏宗祠、張氏宗祠、愈喬二公祠、述卿書室、覲廷書室、清暑軒、洪聖宮、楊侯古廟、橫洲村二聖宮和聚星樓，位於廈村的友恭堂、廈村古炮、天后古廟、楊侯宮、靈渡寺、友善書室和廈村市，位於新田的永秀文公祠、麟峰文公祠、萃野文公祠、明遠堂、文氏宗祠、東山古廟、楊侯宮、石壇公和大夫第，位於八鄉的廷桂鄧公祠、蘭芳書室、郭氏宗祠、梁氏宗祠、彝華蔡公祠、嶺梅莊、黎氏宗祠、植桂書室、大紀家塾、八鄉古廟、凌雲寺、眾聖宮、關帝聖宮和橋碑，位於十八鄉的大樹下天后廟、關帝廟、林氏家祠、蔡氏家祠、謝氏宗祠、潘屋、克述堂、兆元書室、龍田書室、路碑、五奎書室和達道橋等六十多項古蹟；〈掌故及軼事〉，述說相關傳說和人物共十七項；〈傳統節日及習俗〉，簡介包括天后寶誕、太平清醮、農曆年的風俗、風水命理、吃盆習俗、祭祖儀式和嫁女風俗。書中舊照片的排放和印刷均有助重構舊元朗的歷史面貌。

■ **西貢區**

〔19〕西貢區議會：《西貢風貌》，香港：該會，2002。（127 頁）

西貢區位於新界的東部沿海，範圍包括西貢、坑口鄉郊及將軍澳。[12] 本書初版於 1994 秋由西貢區議會出版，至 2002 年再版時，除了補充文字內容外，並加入大量彩色古今圖片。全書共五章，第一章〈西貢〉，介紹該區天后廟、關帝廟的政治和經濟重要性、蠔涌才俊、南圍鹽田、北港村田園風光和銀盤青螺白沙灣特色；第二章〈坑口〉，敘述布袋與洪聖宮、坑口小鎮、坑口墟的誕生、西沙二村及香港科技大學的歷史；第三章〈西貢離島〉，包括南北佛堂、佛堂洲、羊洲和釣魚翁山、滘西洲、鹽田仔、吊鐘洲、萬宜水庫、糧船灣、果洲群島、大浪灣、西灣、黃宜洲和火石洲等歷史遺址和自然景象；第四章〈文化與風俗〉，介紹天后誕、竹枝詞、扒龍 舟迎親、麒麟會、山歌、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上窰民俗文物館、滘西洲高爾夫球場與漢代出土文物；第五章〈飲食〉，談及糧船灣蜑家盆菜與泥鰾粥，史料與趣味兼備。

〔20〕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編著：《西貢歷史與風物》，香港：西貢區議會，2003。（192 頁）

本書共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論——西貢行政區域的劃分與發展〉，述說該區自十九世紀中葉以前至 1980 年代的地方政制發展；第二部分是〈都市化的多元性〉，包括第一節西貢墟的多元發展、第二節從坑口墟到將軍澳新市鎮、第三節從疏離到融合：調景嶺的蛻變；第三部分是〈鄉村社會的變遷〉，包括第一節西貢鄉村社會組織與生活、第二節西貢漁民社會組織與生活；第四部分是〈歷史里程中的種種〉，包括第一節東江游擊隊與抗日戰爭期間的西貢、第二節萬宜水庫的興建、第三節西貢的人文社會；書末附有〈西貢歌謠〉，分別介紹本地歌、客家歌謠和水上人的歌謠。

---

12 西貢區議會地區摘要，參閱 http://www.districtcouncils.gov.hk/sk/chinese/welcome.htm，擷取日期：2011 年 8 月 1 日。

■ 離島區

〔21〕離島區議會：《香港離島區風物志》，香港：該會，2007。（301 頁）

離島區約由二十多個大小不一的島嶼組成，主要島嶼有大嶼山、南丫島、長洲、坪洲及蒲台島等。[13] 本書共八章，第一章〈歷史篇〉，述說大嶼山（東涌區、大澳區、大嶼南區、梅窩區）、坪洲、長洲、南丫島及蒲台島的概況。第二章〈考古篇〉，回顧離島的考古今昔，在文物與歷史一節中，介紹史前時代、先秦、秦漢、唐宋和明清時期的考古發現，以及重要考古遺址。第三章〈古蹟篇〉，介紹大嶼山的二十四項古蹟，包括炮台、廟宇、警署、學校、石刻、石碑、大屋和更樓等，也介紹坪洲的祠廟、圖書館、灰窰遺址、火柴廠和祠堂等八項古蹟，長洲的石刻、古廟、中學、界石、警署、醫院、公安局和教會等十三項古蹟，以及南丫島與蒲台島的古廟、家塾、石刻和祖屋等十項古蹟，內容豐富。第四章〈風光篇〉，講述離島十景及三十九處風光明媚的景色。第五章〈風俗篇〉，簡介該區的神誕、傳統節日、醮祭、家族祭禮和其他風俗。第六章〈物產篇〉，介紹著名的香品、食鹽、燒灰、珍珠、茶葉、海產、農業、動植物、食品、礦物、原料和工藝物產。第七章〈藝文篇〉，收集與該區相關的詩詞、新詞、歌謠和山水畫等，盡顯詩情畫意的情懷。第八章〈搜奇篇〉，以歷史掌故、鬼怪神話、風水傳奇、廟趣奇談和寶藏趣談為分類，介紹了三十八項鮮為人知的奇人奇事。

總　結

綜觀二十年來各區區議會精心出版的風物志，突顯了本土對保存地區歷史的關注。就編著者而言，從出版風物志的編纂統籌委員會，逐漸發展由歷史學專家、學者擔任主編和撰寫的工作，達致質量俱備，規模和篇幅有逐漸擴張之勢。就內容而言，這些風物志多以百科全書式撰寫，內容豐富，包羅萬有，有助從多角度瞭解該區的歷史沿革與演變，從古到今，中西薈萃，圖文並茂。唯部分風物志的內容結構較為鬆散，有待改善。就資料搜集而言，不但運用了不少歷史檔案和文獻，包括英國國會文件、香港政府檔案與刊物、年鑑、古籍、縣志、族譜、詩詞、歌曲、中英文報章、碑文、石刻和古今照片等，同時也積極進行實地考察和口述訪問，對於保存和紀錄香港歷史資料亦具貢獻。香港十八區的風物志，除了反映各區的歷史發展，有助探討區內的民眾生活和文化傳承外，也能勾起一段段被人遺忘的歷史，成為窺探香港歷史發展全貌的有效工具。關於全港性風物志的出版，現可見者是蔡子傑編著的《香港風物志》（香港：環球實業 [香港] 公司，2008），本書共十三章（574 頁），包括〈導言〉、〈山水篇〉、〈鄉村族譜篇〉、〈戰爭篇〉、〈海盜篇〉、〈街道地名篇〉、〈訪古篇〉、〈香港史前人類〉、〈香港古代之水陸交通〉、〈香港協辦奧運馬術比賽〉、〈人物篇〉、〈風俗篇〉和〈神話傳說篇〉。作者以出任記者的數十年工作經驗，憑藉個人力量撰寫和出版一本屬於全港的風物志，殊不簡單，毅力和決心尤值關注。最後，隨著時日的轉變和社會的進步，不少關於各區內的發展情況和歷史進程已有不少變化，因此現已出版的風物志仍有待進一步的更新。

13　離島區議會地區摘要，參閱 http://www.districtcouncils.gov.hk/island/chinese/welcome.htm，擷取日期：2011 年 8 月 1 日。

《當代史學》第11卷第3期（2012年9月）

❖ 婦女史研究 ❖

從五四時期婦女報刊看中國新女性形象的確立*

周佳榮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

（一）引言：清末民初婦女報刊的興起

近代中國的婦女報刊萌生於晚清時期，至民國初年而臻於成熟。從發展歷程而言，晚清時期是中國婦女報刊的萌芽階段，篳路藍縷，開創先河的時代意義是非常重大的。在中國婦女文化史上，女性參與新聞活動和出版報刊是近代才出現的創舉，這現象與新女性群體的興起有相當密切的關係。因為清朝覆滅前的十幾年間，適逢二十世紀開展之初，新知識、新學說的傳入致使啟蒙思潮大起，女權觀念逐漸形成和加強，促使中國女性角色急劇出現轉變，女性在社會上的地位也有所提升。[1]

婦女報刊簡稱「女報」，主要是指以婦女為讀者對象的報紙和雜誌，女校、女學會和婦女團體出版的期刊，以及由女性主編的一般性刊物（因其內容通常與婦女有較大關係亦被列入婦女報刊）；在晚清時期，還包括一些倡導不纏足（天足）的報刊，入民國後，以女性居大多數的專業（如護士學會）學刊亦在探討之列。論者已予指出：「無論從女性研究角度，新聞史研究角度，還是從有益於當今婦女報刊與女新聞工作者發展的角度，關於婦女報刊和女新聞工作者的研究都應該是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2]

中國最早的婦女報刊，是 1898 年女學會在上海創辦的《女學報》（旬刊），自此以至 1911 年辛亥革命爆發為止，中國各地出現的婦女報刊約有四十種左右，此起彼落，締造了婦女界參與出版活動的一次熱潮。在中國婦女報刊發展史上，晚清時期（1898–1911 年）是第一波，在時代流轉和社會巨變前夕發出呼聲，反映了婦女對未來的期待和憧憬。民國成立後，各地的婦女報刊繼興，反映了婦女對新政體的熱心和參與，其中有的持續出版長達二三十年。例如 1912 年在上海創辦的《女鐸報》（月刊），抗日戰爭時期一度停刊，最後於 1950 年終刊，

* 本文是「五四的女兒：近代中國婦女報刊研究之二」的部分成果，此項研究計劃獲香港浸會大學教職員研究經費資助，謹此致謝。

1 周佳榮〈近代中國女性角色轉變的關鍵——晚清時期婦女報刊析論〉（未刊稿），此文是「晚清新女性：近代中國婦女報刊研究之一」的研究報告。

2 宋素紅著《女性媒介：歷史與傳統》（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6 年），〈前言〉。

是近代中國出版時間最長的綜合性婦女刊物；1915 年商務印書館在上海創辦的《婦女雜誌》（月刊），共出十七卷，至 1931 年底停刊，有較大的代表性和影響力；1917 年在杭州創刊的《婦女旬報》，出版至 1935 年停刊，1946 年復刊，1948 年終刊，也是出版時間較長的一種婦女刊物。民國前期（1912—1927 年）顯然為中國婦女報刊的第二波，是婦女報刊進一步發展的新階段，表達了新時代女性在新文化的沐浴下，致力於尋求政治參與和社會定位。民國後期（1928—1949 年）是婦女報刊出版的第三波，中國知識女性在國民黨當權和共產黨興起的兩大政治立場之間，面臨個人的取態和抉擇，因而出現了意向分歧。旋因抗日戰爭爆發，抗戰勝利後不久又陷於國共內戰的局面，中國婦女報刊在內憂外患頻仍的動亂環境下，艱辛尋找國家民族的出路。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自是另一個新階段的開始了。

本文旨在強調，晚清時期出現的婦女報刊，是促使二十世紀中國女性角色轉變的關鍵要素之一，婦女報刊與新女性群體的互動，自始已見其端倪；民國初年創辦的婦女報刊，且逐漸擴大其影響，對於確立中國新女性的形象尤有積極作用，加上五四新文化的推動，更展現了時代激情和浪漫色彩。以下將集中於三方面的探討：第一，是五四時期婦女報刊的出版情形、言論內容和時代特色；第二，是婦女報刊與女校、婦女團體以及政治組織的關係；第三，是婦女報刊如何塑造現代中國女性的性格和形象。本文還希望兼顧到當時比較開明進步的男性知識分子如何響應時代女性的訴求和呼聲，給予她們支持和助力，從而為中國締造更平等的條件，共建一個兩性和諧的新社會。

（二）五四新文化與書報出版業的發展

1915 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月刊），是新文化運動的濫觴，宣告一個新時代的來臨；次年該雜誌改名為《新青年》，復因陳獨秀應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之聘，出任北大文科學長，《新青年》的編輯工作也隨之轉移到北京。此後《新青年》進一步擴大其影響，既催生了 1919 年率先在北京爆發的五四運動，也促使新文化運動與愛國運動合流，匯成浩浩蕩蕩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這個運動的基本精神是提倡「德先生」（Democracy）和「賽先生」（Science），即民主與科學。有趣的是，1926 年開明書店以一種題為《新女性》的月刊奠定其根基，該店且成為五四新文化的殿軍，出版了不少具代表性的文藝創作和學術專著。由《新青年》到《新女性》，顯然是前後呼應和一脈相承的。[3]

1917 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在他的主持下，北大成為新文化的搖籃。1919 年，充份表達了愛國熱情的五四運動在北京爆發；在這一年，鄧春蘭要求蔡元培許可女子進入大學讀書，蔡元培同意，北大遂開國立大學取錄女生的先例。自晚清以來，女子教育的發展是一個頗可注意的現象，當時的進步人士意識到女子教育與國家民族的興衰關係至大，興女學的呼聲和辦女校的活動漸趨普遍。二十世紀初年，清朝學部已開始籌劃女子教育制度的具體內容；到了民國初年，女子教育納入新學制之內，中、小學男女同校和高等院校招收女生，使女性接受學校教育的機會大增。

1919 年 6 月在天津創辦的《醒世》（週刊），是五四運動爆發後率先由女子編輯出版的一個刊物，編印者是天津直隸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至同年 12 月共出版了二十多期。1919 年 8 月在北京創辦的《新生活》（週刊），則是一種小型通俗刊物。1919 年 10 月在長沙出版

3　周佳榮著《開明書店與五四新文化》（香港：中華書局，2009 年），頁 2–3。

的《女界鐘》，是湖南長沙周南女校師生創辦的進步婦女刊物，次年 3 月 11 日停辦。

在五四潮流的激蕩下，1920 年是婦女報刊非常興旺的一年，新辦的刊物多達七種，刊行時間長短的差異則很大。首先，1920 年 1 月 1 日在上海出版的《新婦女》（半月刊），是一種進步婦女通俗刊物，1921 年第 5 卷第 2 號付排時，因承印的國光書局失火，該刊稿件被毀，遂告停辦，共出二十五期。《新婦女》的創辦人是上海務本女子中學的五位教師，在愛國運動罷課的時候組織了一個雜誌社，《新婦女》刊行的意思，「就是要改造現社會，使婦女有徹底的覺悟，將來能夠共同擔負新社會上一切重大責任。」具體的主張是：「一、掃除現社會上一切阻礙新婦女的思想制度風俗；二、研究新婦女應當採取的進行方法和應走的途徑；三、選擇介紹歐美各國關於婦女的新思潮，做新婦女的考鏡；四、切實調查現社會上各種婦女的生活狀況，做改良的準備。」[4]

《新婦女》的內容是比較充實的，它提出了「婚姻自主」、「婦女經濟獨立」、「社交公開」、「男女同等教育」、「婦女參政」等口號。新文化運動反對舊禮教、舊道德、舊家庭，該刊首先批評了男尊女卑和重男輕女的思想，反對不合理的舊婚姻制度，主張離婚的自由，還提出婦女再嫁、禁止早婚、改良結婚儀式、廢除聘金妝奩制度等問題。當中許多文章都強調婦女經濟獨立的重要性，為了解決婦女職業和教育問題，他們還提出舉辦兒童公育、會食和女子生計教育、家庭俱樂部等，企圖以此改良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5]

其次，在 1920 年 2 月之前創辦的《天津婦協月刊》，是一種進步婦女刊物，其初為月刊；1929 年 4 月 1 日改為旬刊，期數另起，同年 7 月 20 日出版第 11 期，但停刊時間不詳。1920 年 2 月 1 日，《北京女高師半月刊》創刊，是五四時期的進步女校刊物，但僅見第 1 期。〈發刊詞〉強調：「現在這個時代是個甚麼時代呢？是國家多難的時代，是思想改革的時代，是一切行為制度沒有標準的時代，總說一句，是黑暗的時代，是新陳不接的時代。……自從近幾年來，西方文明漸漸輸進我們中國，一切舊制度根本上起了動搖，社會上就起了種種擾亂的現象，以至於新的太新，舊的太舊；一方拼命前進，一方拼命後退；冰炭不同，如合能合攏得來？」[6]

《北京女高師半月刊》第 1 期中，有一篇〈現在的女子這樣才算做人〉是討論婦女解放問題的，主張女子先從家庭方面、學校方面、社會方面、國家方面，都作些男子所做的事，不承認以前種種不把女子當做人的制度，並且用學識來幫助奮鬥。總的來說，該刊反映了五四時期的青年迫切要求改革中國社會、挽救國家的願望，言論內容是比較溫和的，但仍不免受到當時軍閥政府的扣查。[7]

1920 年 5 月 1 日蘇州有《婦女評論》面世，亦是一種進步婦女刊物，初為半月刊，第 2 卷第 1 期起改為月刊。必須指出，《婦女評論》的主張與一般婦女報刊的見解是不盡相同的，該刊的〈宣言〉列出五點：

> 第一，我們認婦女問題決不僅僅是「婦女」一方面的事，婦女受壓迫，決不是僅僅「婦女」一方面受損害。……在人類平等（人道主義）與母性尊重這兩個意義之外，

---

4 〈新婦女半月刊宣言〉，《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二集下冊（北京：三聯書店，1959 年），頁 547–548。

5 〈新婦女〉，《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二集上冊，頁 179–188。

6 素秋〈北京女高師半月刊發刊詞〉，《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三集下冊，頁 450–452。

7 〈北京女高師月刊〉，《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三集上冊，頁 83–85。

特為社會進化這觀念，來根本地主張婦女解放，……。

第二，……女性受了數千年「非人」的待遇，當然他/她們底知識，道德……都要比男子低一點。……根據了這信念，我們根本地反對那些說「婦女程度不配」的人們；所以對於那些把「婦女教育問題」看做婦女問題底「先決問題」的言論，不敢附和，而且視為不懂婦女問題的真意義。

第三，我們認現社會的一切問題有一個總歸結；這總歸結就是「胃的問題」，就是「食的問題」，就是「經濟問題」。……我們雖不鼓吹任何女子皆當謀生計的獨立，但我們卻極端主張女子應有絕對的自由勞動權。……我們主張一切職業都要開放給女子，而且要和男子同等待遇。

第四，……我們以為在現社會內，自由結婚與自由離婚一樣的很重要。……

第五，家庭制度，……這變化底總趨勢便是由「大」趨於「小」，就是家庭底簡單化。……但我們底目的是在廢除家庭，主張簡單化也不過是就目前而論。[8]

〈宣言〉又強調：

我們覺得僅僅叫現在的女性做成和現在的男性一樣的人不是討論婦女問題的根本辦法。……女性底要求如果僅僅限於取得和男性同樣的現在已有的生活，這有甚麼大意思呢？這對於將來社會的建設有甚麼大利益呢？所以我們對於那些純乎是「女性主義者」所發的言論一概要反對。我們不承認那些「把女子提到和男人一樣的地位」的謬論；我們不譚荒謬可笑的甚麼「男女平權」；我們是主張解放了歷來施於女性的種種束縛，讓女性自由發展出他/她們底能力來。凡思想、制度，能彀成為新鎖鐐的，我們都要不容情的攻擊。[9]

《婦女評論》中談到的一個中心問題是「兒童公育」，第 1 卷第 2 期（1920 年 5 月 16 日）刊出寶珩〈兒童公育問題〉、友琴〈兒童公育與婦女勞動〉、紹虞〈婦人勞動與嬰兒的關係〉，部分作者認為，要解放婦女，就非實行「兒童公育」不可，「經濟獨立」是婦女解放的先決條件，所以他們對於工讀主義很感興趣，第 2 卷第 1 期（1920 年 9 月 1 日）發表蓮枝〈婦女解放的先決條件——要謀「經濟獨立」〉，對此作出了論述。也有人把婦女爭得參政權看做婦女徹底解放的標誌，甚至認為婦女參政是達致世界和平的唯一方法，第 2 卷第 3 期（1920 年 11 月 1 日）刊載俞煥斗〈中國女子心理的改造及今後在社會上應負底責任〉，還主張把現代女子的心理徹底改造一下。[10]

1920 年 5 月 4 日，上海有《解放畫報》（月刊）的創辦，是一種以寫婦女問題為主的通俗讀物，出現至第 16 期，此後情況不明。值得注意的是，該刊的新聞專欄報導了國際婦女運動和國內婦女運動的消息，對於五四運動後重新恢復起來的中華女子參政同盟會的活動，以及廣東、湖南等地的婦女參政運動，也作了報導。[11]

1920 年在南京創刊的《中華護士報》（季刊），是中華護士學會會刊，1941 年 10 月出版第 22 卷第 4 期後停刊，1947 年改名為《中國護士季刊》。這是近代中國最早的護士刊物，在

---

8 〈婦女評論宣言〉，《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二集下冊，頁 552–554。

9 同上註，頁 554。

10 〈婦女評論〉，《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二集上冊，頁 189–195。

11 〈解放畫報〉，《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二集上冊，頁 196–200。

某種意義上亦可視為刊行時間較長的婦女報刊。1920 年 10 月左右，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主辦的《女青年報》在上海創刊，是一種宗教刊物，初為季刊，1922 年 10 月改為月刊，第 8 卷起年出十期，1926 年 3 月改名《女青年月刊》，至 1937 年 7 月出版第 16 卷第 7 期後停刊。在近代中國出版史上，這是刊行時間較長的婦女報刊之一。

（三）婦女報刊與婦女運動的進程

1921 年中國共產黨創立，此後出現了一批革命婦女刊物。這年 2 月 13 日，廣州有《勞動與婦女》（週刊）的創辦，至同年 4 月 24 日，共出十一期。經常為這個刊物做編輯和撰稿工作的，有沈玄廬、陳獨秀、譚鳴謙（即譚平山）、陳公博等人。該刊首先闡述的一個問題，就是階級社會裏勞動者和婦女的共同遭遇，而在婦女解放問題上，主張必須消滅人剝削人的不平等的階級制度。[12]

1921 年 8 月 3 日，上海有《婦女評論》（週刊），是《民國日報》的副刊，至 1923 年 5 月 15 日，共出一百零四期。該刊的編輯和撰稿人有不少是新文化運動及婦女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包括陳望道、沈雁冰、邵力子、楊之華等人。論者指出：「從《婦女評論》的文章看來，在提出經濟獨立、婦女參政、婚姻自由等口號時，已經大大超過要求男女平權、個性解放的範圍，開始注意和消滅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私有制進一步聯繫起來，認定只有消滅私有財產制度，消滅剝削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才能使婦女在政治、經濟上和男子完全平等。」[13]

《婦女評論》登載了不少關於女工生活狀況的調查文章，從中可以看到女工的痛苦生活，還特地出版上海絲廠女工罷工問題專號，用很大篇幅敘述罷工的經過，宣揚女工的團結精神，以及歌頌罷工的勝利。順帶一提，1922 年 9 月 6 日創刊的《現代婦女》，被稱為《婦女評論》的「可愛的妹妹」，是婦女問題研究會和中華節育研究社共同出版的。其後，為了進一步擴大對婦女運動的宣傳，婦女評論社和婦女問題研究會決定合併改組，出版《婦女週報》，《婦女評論》和《現代婦女》同時宣告停刊。[14]

1921 年 12 月 13 日，上海有《婦女聲》（半月刊）面世，名義上由上海中華女界聯合會主辦，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上海黨組織指導婦女運動的刊物，由中共中央宣傳部主任李達主持，現時所見的最後一期，是 1922 年 6 月出版的第 10 期。《婦女聲》「專以宣傳被壓迫階級的解放，促醒女子加入勞動運動為宗旨。」而在某些具體的問題上，各人的著眼點並不完全相同，其中一個討論得較多的是廢娼問題，也有人對節制生育進行了宣傳。此外，還有介紹平民女校的「平民女校特刊號」。[15]

1922 年 9 月 6 日，上海有《現代婦女》（旬刊）出現，是《時事新報》副刊，1923 年 8 月 16 日出版第 34 期。1922 年 12 月 15 日，廣州有《新婦女》（月刊）出現，僅見第 1 卷第 1 號。1923 年 4 月在天津創辦的《女星》（旬刊，每月逢五出版），是《新民意報》的副刊。1923 年 8 月 22 日在上海創辦的《婦女週報》，是《民國日報》副刊；1925 年 8 月 25 日出版第 100 期後，曾一度停刊；同年 11 月 4 日出版復刊後的第 85 期後，再度停刊；1926 年 1 月 6 日續

---

12 〈勞動與婦女〉，《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二集上冊，頁 80–85。

13 〈婦女評論〉，《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二集上冊，頁 213。

14 同上註，頁 218–221。

15 〈婦女聲〉，《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二集上冊，頁 201–212。

出復刊後的第 86 期，但終刊日期不詳。論者認為：「向警予曾任主編的《婦女週報》能結合政治鬥爭，聯繫實際，成為當時唯一能反映全國婦女運動全貌的刊物。」[16] 1924 年 1 月 1 日，天津有《婦女日報》的創辦，是中國共產黨創立時期唯一由婦女主辦的一份報紙，同年 9 月停刊。《婦女日報》由覺悟社成員創辦，鄧穎超等曾任編輯。該報積極推進婦女解放運動，報導天津以及全國婦女界活動的消息，傳播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為促進第一次國共合作和擴大革命勢力在北方地區的影響，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1924 年 12 月 10 日在北京創辦的《婦女週刊》，是《京報》附設的三種週刊之一，1925 年 12 月 20 日停刊。

上述幾種刊物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創立時期婦女運動的開展情況，1925 年及 1926 年間創辦的多種婦女報刊，則較多地表現了國民革命時期婦女運動的特點。1925 年 6 月在廣東創刊的《光明》（月刊），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廣東省婦女解放協會會刊，1925 年底更名《婦女生活》，1926 年 4 月後改為雙月刊。1925 年 6 月，武漢有兩種婦女報刊出現：一種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漢婦女協會會刊《武漢婦女》（旬刊），後改名《湖北婦女旬刊》；另一種為《湖北婦女》，是中國共產黨湖北區委領導的湖北婦女協會機關刊物。這兩種刊物均於 1927 年中停辦。1925 年 12 月 16 日，廣西有《婦女之光》創刊，是廣西婦女聯合會機關刊物，後於 1926 年冬至 1927 年春停辦。1925 年 12 月 30 日，上海有《中國婦女》面世，是上海婦女聯合會機關刊物，初為旬刊，1926 年 7 月後改為月刊，同年下半年終刊。

五四新文化對婦女界的影響，從 1926 年 1 月 1 日在上海創辦的《新女性》（月刊）可見一斑，該刊出版至 1929 年 12 月 1 日後，是一種傾向進步而又具有較廣泛影響的婦女刊物。（詳後）1926 年在北京有三種女校刊物創辦，亦是值得注意的事：第一種是 1926 年 6 月 1 日創辦的《京師公立第一女子中學校月刊》，至 1927 年 8 月共出十期；第二種是 1926 年 10 月創刊的《國立女子學院師範大學部週刊》，至 1927 年 5 月共二十九期；第三種是 1926 年 11 月 3 日出版的《國立女子學院師範大學部週刊 18 周年特刊》，是前者的特刊。

不過，在北伐戰爭時期，婦女報刊自不免沾上時代的特色，其中不少報刊是由共產黨或國民黨創辦。1926 年 3 月 8 日有兩種新刊：其一是在江蘇創辦的《吳江婦女》，是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婦女部機關刊物，後因人力、財力困難而停刊；其二是在湖南創辦的《婦女先鋒》（月刊），是湖南女界聯合會會刊。這年 3 月間，廣州有一種題為《廣東婦女》（月刊）的進步婦女刊物創辦，是廣東女權運動大同盟機關刊物，至 1927 年 7 月共出九期。1926 年 6 月，在廣西邑寧（今南寧）創辦的《革命婦女》，是國民黨廣西省黨部婦女部的機關刊物，同年 12 月出版第 7 期。1926 年 9 月在北京創辦的《婦女之友》（半月刊），是這時期的一種進步婦女刊物，1927 年 4 月出版第 12 期後停刊（第 13 期起改在上海出版）。在 1927 年之前，還有一種題為《婦女之聲》的旬刊在廣州創辦，是國民黨中央婦女部和廣東省黨部婦女部的機關刊物，第 18 期後改為不定期刊，約於 1927 年停刊。

1927 年 3 月 8 日，漢口有《赤女雜誌》創辦，是中國共產黨機關刊物之一，僅見一期。1927 年 8 月，北京有一種名為《覺》的半月刊創辦，是這時期的一種進步婦女刊物，旋即被迫停刊；1928 年 7 月 15 日復刊，現時所見的最後一期是同年 9 月 15 日出版的第 6 期。此外還有一種題為《婦女》的綜合性月刊，約於 1927 年 11 月在天津創刊，1928 年 6 月 10 日，出版至第 2 卷第 2 期。大體上說，這幾年間面世的婦女報刊，大多是為了配合政治運動的發

16 方漢奇、史媛媛主編《中國新聞事業圖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 157。

展而創辦的，時移世易，因此出版時間一般都較短，如曇花一現，卻又引人注目。

（四）從《婦女雜誌》到《新女性》

在戊戌維新時期成立、有「出版界元祖」之稱的商務印書館，於 1915 年創辦《婦女雜誌》，主編是章錫琛。該誌眾多作者心目中的新婦女特徵，是「突破了以往將才智限制於家庭小天地的民初婦女」；還有，就是「她們打破了女子的地位依靠著她所屬的男性來決定的既有成就。」[17]

五四新文化運動使當時中國的文化界分為新舊兩派。舊派的出版家多數是商人，他們在思想上偏於保守，不能很快地接受新文化，尤其是在 1919 年五四運動爆發後的幾年間，許多宣揚新思潮的著譯文稿和新文學作品，由於不被他們接納而沒有印行的機會，作家不得不自己想辦法，爭取自己的作品能夠出版和得以流通。章錫琛就是因為將他主編的《婦女雜誌》的思想轉向新思潮，提倡婦女解放，結果被迫離職，而成為新文化的出版商。[18]

1925 年 1 月，章錫琛推出《婦女雜誌》「新性道德專號」，主張道德應隨時代變化，反對陳腐的舊性道德。北京大學教授陳大齊在 3 月 14 日出版的《現代評論》第 1 卷第 14 期，發表〈一夫多妻的新護符〉一文，對此加以反駁，並且引起爭論。[19] 其他報刊和某些學界名流，亦群起攻擊。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王雲五認為章錫琛有失體統，又使《婦女雜誌》成為眾矢之的，心中不悅，在 8 月間就裁撤了章錫琛的主編職位。當時任職於商務印書館的鄭振鐸、胡愈之看不過去，魯迅（周樹人）對此也表示不滿，章錫琛在他們和友好吳覺農等人的支持下，自辦《新女性》雜誌，不料又為王雲五知悉，竟以兩千元「退俸金」將他辭退。[20]

《新女性》於 1926 年 1 月創刊，發行人署名吳覺農，創刊地址也是在他家裏（上海三德里 A19 號），以為這樣的安排可以避免商務印書館責難。結果章錫琛被辭退了，大家見他已經失業，就鼓勵他公開主編《新女性》，此外還出版了《婦女問題十講》、《新性道德討論集》等「婦女問題叢書」，銷路很好，於是章錫琛就在家裏（上海寶山里 60 號）掛出招牌，正式成立開明書店。[21]

《新女性》闢有論文、專題討論、詩、漫畫、歌曲欄目，內容主要介紹國內外著名女性，探討婦女戀愛、婚姻、家庭等多方面的社會問題，和刊登反映婦女生活的文藝作品。周建人在創刊號上發表〈二重道德〉一文，被視為該刊的發刊詞，文中指出雜誌的創辦目的在於打破重男輕女的舊習，而要掃除這些迷信和不潔思想，「知識的普及便見得重要了——自然尤其是性知識。」同期還有章錫琛〈新女性與性的研究〉，批駁張競生的「性學」。該刊又曾進行「現代女子的苦悶問題」等專題討論，參加討論的有周作人、孫伏園、樊仲雲、周建人、陳學昭、沈雁冰（茅盾）、蔡元培、李石岑、陳望道、徐調孚、顧頡剛等。商務印書館的《婦女雜誌》改由杜就田主編後，內容又恢復到怎樣做個好主婦之類的主題上來，專門談些給孩子餵奶的方法、做雞蛋糕的方法之類，銷數一落千丈，而《新女性》則把《婦女雜誌》的讀者

---

17 周其敘著《一九一〇~一九二〇年代都會新婦女生活風貌——以〈婦女雜誌〉為分析實例》（台北：台灣大學出版社委員會，2006 年）。

18 施蟄存〈緬懷開明〉，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編《我與開明》（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5 年），頁 63。

19 葉再生《中國近代現代出版通史》第 2 卷（北京：華文出版社，2002 年），頁 1210。

20 周佳榮著《開明書店與五四新文化》，頁 5。

21 同上註，頁 5–6。

拉了過來，每期銷數達到三五千冊。有論者強調，「兩本刊物對比之下，就看得出關於婦女問題的兩種思想系統。」[22]

《婦女雜誌》在五四時期被認為是偏於保守的婦女刊物，雖稱「謀婦女解放」，但反對婦女參政，「仍要求婦女做賢妻良母，帶有一定的封建思想色彩。」[23] 不過，在新舊思想雜陳的時代，《婦女雜誌》的存在有其社會意義和重要性，對於那時代的婦女來說是另一種可供選擇的讀物。《新女性》出版至 1929 年底停刊，與此相關的「婦女問題叢書」有兩種：第一種是日人本間久雄著、章錫琛譯《婦女問題十講》（1924 年被版，1926 年再版，1927 年三版），第二種是章錫琛編《新性道德討論集》（1925 年被版，1926 年增補再版）。開明書店另有「婦女問題研究會叢書」，所收以外國著作的譯本為主，探討婦女與社會、文學的關係，以及戀愛、婚姻、兒童、家庭等相關問題，還有介紹性知識、性與遺傳、性與人生等問題的專書。[24]

（五）結語：中國新女性形象的確立

1919 年至 1927 年間出版的婦女報刊，為數約有四十種，北京與上海各佔九種，數量相當，反映了北京作為新文化的搖籃，在女子教育和新文化書刊出版方面，不讓上海獨佔鰲頭。但對於婦女問題的觀念，上海始終居於領先地位，《新女性》的興起和產生衝擊，是明顯的一個例子。此外，在天津、廣州出版的婦女報刊分別有五種和四種，長沙、蘇州、南京、武漢、漢口以及廣西等地都有婦女報刊的創辦，說明了婦女問題已在全國多個地方引起關注。

政治運動與婦女報刊的關係不容忽視。在五四運動高漲時期的 1919 年及 1920 年間，有《醒世》、《女界鐘》、《新婦女》等創刊；1921 年至 1923 年中國共產黨創立時期，有《勞動與婦女》、《婦女聲》、《現代婦女》等的面世。第一次國共合作之初，在 1924 年和 1925 年，有《婦女日報》、《婦女之光》、《中國婦女》等；而在北伐戰爭時期，婦女報刊的創辦於 1926 年及 1927 年達到新的高峰，有《新女性》、《婦女先鋒》、《革命婦女》等的湧現。

總的來說，近代中國的女權思想經過晚清時期的倡導，在批評重男輕女思想和宣揚婦女自立等問題上，已初步奠定了基礎。尤其是在辛亥革命期間，鼓勵婦女積極關心政治，至民國初年，進一步宣傳男女平等的思想，婦女參政初步得到實行的機會。加上各級女子教育的普及，在五四時期，高等教育逐漸向女生開放，婦女界進而尋求社會定位，呼籲婦女解放，戀愛和婚姻自由，以及一夫一妻制，在人生觀和道德觀方面都有所突破。論者指出，辛亥革命時期是中國現代女性角色模式萌生的時期，五四時期是現代女性角色模式初步構建的時期，先進的中國女性致力於突破傳統的角色模式，不畏艱難地塑造著新型的家庭角色和豐富的社會角色，從而開闢出女性角色的現代化之路。[25]

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在眾多的婦女報刊倡導下，中國婦女之間的差異性持續擴大，遂演成傳統婦女與新女性對決，以至分道揚鑣的局面。歷史顯然為中國作出了走向新女性的抉擇，然而有趣的是，傳統婦女的美德和典範，雖屢遭新思潮衝擊而在新時代仍具有意義和魅力。至今在中文詞匯裏，「婦女」多少帶有傳統味道，「女性」則較富摩登色彩，而使

---

22 施蟄存〈緬懷開明〉，《我與開明》，頁 63–64。

23 方漢奇、史媛媛主編《中國新聞事業圖史》，頁 156。

24 鄒振環著《20 世紀上海翻譯出版與文化變遷》（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2000 年），頁 160。

25 蔣美華著《20 世紀中國女性角色變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年），頁 139–144。

用「婦女」的情況一般是較為普遍的。歷史告訴我們，五四時期的反傳統思潮，有助於中國新女性形象的確立；傳統婦女的內在美德，實亦可以成為時代女性素養的有機組成部分，這應該是二十一世紀中國人社會的新課題吧。

附表　民國前期婦女報刊一覽（1912–1927 年）

創刊年月	報刊名稱	出版地點	刊期/性質	內容簡介	停刊年月
1912.4.1	《女鐸報》	上海，1945 遷成都，1946 遷回上海	月刊	中國近現代出版時間最長的綜合性婦女刊物	1942 出三十卷後曾一度停刊，1944.7 復刊，1950.12 終刊，前後共出三十五卷
1912.5	《女權》	上海	月刊	辛亥革命時期的婦女刊物，女權雜誌社總發行	僅見第 1 期
1912.10.21	《女子白話旬報》、《女子白話報》	北京	初為旬刊，第 8 期起改為月刊	辛亥革命時期的進步婦女刊物之一，第 8 期起改名《女子白話報》	不詳(第 11 期於 1913.5.30 出版)
1912.11	《神州女報》	上海	初為旬刊，1913.3 改為月刊	辛亥革命時期的進步婦女刊物	不詳 (現見最後一期為月刊第 4 期)
約 1912	《揚州女子公學女子月報》	揚州	月報	辛亥革命時期的婦女刊物	不詳
1913.4	《萬國女子參政會旬報》、《萬國女子參政會月刊》	上海	初為旬刊，第 4 期起改為月刊	辛亥革命時期的進步婦女刊物之一，第 4 期起改名《萬國女子參政會月刊》	不詳
1914.10	《婦女鑒》	四川成都	月刊	辛亥革命時期的婦女刊物	1914.12 出版第 3 期後停刊
1914.12.10	《女子世界》	上海	月刊	辛亥革命時期的婦女刊物	僅見第 1 至 6 期
1914	《香艷雜誌》	上海	月刊	辛亥革命時期的婦女刊物	1915 (共出十二期)
1915.1.25	《中華婦女界》	上海	月刊	辛亥革命時期的婦女刊物	1916.6.25 (共出十八期)
1915.1	《女子雜誌》	上海	月刊	辛亥革命時期的婦女刊物	僅見第 1 期
1915.5.5	《婦女雜誌》	上海	月刊	中國近現代創辦時間較長的婦女刊物	1931.12 (共出十七卷)
1915.11	《江蘇省第二女子師範學校校友會刊》	蘇州	每年 2 冊	辛亥革命時期的女校刊物	不詳 (現見最後一期為第 19 期)
1915	《家庭雜誌》	上海		辛亥革命時期的婦女刊物	僅見第 1 期
1916.4	《直隸第一女師範校友會會報》	天津		辛亥革命時期的女校刊物	共出兩期
1916.12	《青年女報》	上海	季刊	上海基督教女青年總會	不詳 (現見最

				編輯發行	後一期為第五年第一冊)
1917.6.1	《婦女旬刊》	杭州	旬刊	中國近現代出版時間較長的婦女刊物	1935.11.1 出版第 19 卷第 20 期後曾一度停刊，1946.10 復刊，1948.11 終刊
1919.6	《醒世》	天津	週刊	五四運動時期天津第一個由女子編輯出版的刊物，由天津直隸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編行	1919.12 (共出二十多期)
1919.8	《新生活》	北京	週刊	五四時期小型通俗刊物	
1919.10	《女界鐘》	長沙		五四時期的進步婦女刊物，由湖南長沙周南女校師生創辦	1920.3.11
1920.1.1	《新婦女》	上海	半月刊	五四時期的進步婦女刊物	1921.5 第 5 卷第 2 號付排時承印局失火，即停刊，共出二十五期
1920.2 以前	《天津婦協月刊》	天津	初為月刊，1929.4.1 改為旬刊，期數另起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進步婦女刊物	不詳 (第 11 期於 1929.7.20 出版)
1920.2.1	《北京女高師半月刊》	北京	半月刊	五四時期的進步女校刊物	僅見第 1 期
1920.5.1	《婦女評論》	蘇州	初為半月刊，第 2 卷第 1 期起改為月刊	五四時期的進步婦女刊物	不詳
1920.5.4	《解放畫報》	上海	月刊	五四時期的進步婦女通俗刊物	不詳 (現見最後一期為第 16 期)
約 1920.10	《女青年報》、《女青年月刊》	上海	初為季刊，1922.10 改為月刊，第 8 卷起年出 10 期	中國近現代出版時間較長的婦女刊物之一，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主辦，1926.3 改名《女青年》	1937.7 出版第 16 卷第 7 期後停刊
1920	《中華護士報》、《中國護士季刊》	南京	季刊	中國現代出版時間最早的護士刊物之一，為中華護士學會會刊	1941.10 出版第 22 卷第 4 期停刊，1947 改名為《中國護士季刊》
1921.2.13	《勞動與婦女》	廣州	週刊	中國共產黨創立時期的革命婦女刊物	1921.4.24 (共出十一期)
1921.8.3	《婦女評論》	上海	週刊	中國共產黨創立時期的革命婦女刊物，為上海《民國日報》副刊	1923.5.15 (共出一百零四期)
1921.12.13	《婦女聲》	上海	半月刊	中國共產黨創立時期革命婦女刊物，名義上由上海中華女界聯合會主辦，實為中國共產黨上	現僅見的最後一期為 1922.6 出版的第 10 期

				海黨組織指導婦女運動的刊物	
1922.9.6	《現代婦女》	上海	旬刊	上海《時事新報》副刊，中國共產黨創立時期的進步婦女刊物	不詳(1923.8.16 出版第 34 期)
1922.12.15	《新婦女》	廣州	月刊	中國共產黨創立時期的婦女刊物	僅見第 1 卷第 1 號
1923.4	《女星》	天津	旬刊(每月逢五出版)	天津《新民意報》副刊，中國共產黨創立時期的進步婦女刊物	不詳
1923.8.22	《婦女週報》	上海	週報	中國共產黨創立時期和大革命時期的革命婦女刊物，為上海《民國日報》副刊	1925.8.25 出版第 100 期後曾一度停刊，1925.11.4 出版復刊後的第 85 期後，再度停刊，1926.1.6 續出復刊後的第 86 期，終刊日期不詳
1924.1.1	《婦女日報》	天津	日報	中國共產黨創立時期由婦女主辦的唯一一份報紙	1924.9
1924.12.10	《婦女週刊》	北平	週刊	《京報》附設的三種週刊之一	1925.12.20
1925.6	《光明》、《婦女生活》	廣東	月刊，1926.4 後改為雙月刊	大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廣東省婦女解放協會會刊，1925 年底更名《婦女生活》	
1925.6	《武漢婦女》、《湖北婦女旬刊》	武漢	旬刊	大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漢婦女協會會刊，後改名為《湖北婦女旬刊》	1927.7 大革命失敗後
1925.6	《湖北婦女》	武漢		中國共產黨湖北區委領導的婦女刊物，為湖北婦女協會機關刊物	1927 年大革命失敗後
1925.12.16	《婦女之光》	廣西		大革命時期廣西婦女聯合會機關刊物	1926 冬至 1927 春
1925.12.30	《中國婦女》	上海	初為旬刊，1926.7 後改為月刊	大革命時期上海婦女聯合會機關刊物	1926 下半年終刊
1926.1.1	《新女性》	上海	月刊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和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初期傾向進步，具有較廣泛影響的婦女刊物	1929.12.1 後
1926.3.8	《吳江婦女》	江蘇		大革命時期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婦女部機關刊物	因人力、財力困難停刊
1926.3.8	《婦女先鋒》	湖南	月刊	湖南女界聯合會會刊	
1926.3	《廣東婦女》	廣州	月刊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進步婦女刊物之	1927.7 (共九期)

				一，廣東女權運動大同盟機關刊物	
1926.6.1	《京師公立第一女子中學校月刊》	北京	月刊	出版時間較長的女校刊物	1927.8 (共出十期)
1926.6	《革命婦女》	廣西邑寧(今南寧)	月刊	國民黨廣西省黨部婦女部的機關刊物	不詳 (僅見1926.12 出版的第 7 期)
1926.9	《婦女之友》	北京，第13 期起改在上海	半月刊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進步婦女刊物	1927.4 出版十二期後停刊
1926.10	《國立女子學院師範大學部週刊》	北京	週刊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女校刊物	1927.5 (共二十九期)
1926.11.3	《國立女子學院師範大學部週刊 18 周年特刊》	北京	特刊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女校紀念刊	
1927 (或稍前)	《婦女之聲》	廣州	旬刊，第 18 期後為不定期刊	大革命時期國民黨中央婦女部和廣東省黨部婦女部的機關刊物	約 1927
1927.3.8	《赤女雜誌》	漢口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機關刊物之一	僅見一期
1927.8	《覺》	北京，1928.7.15 在北平復刊	半月刊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進步婦女刊物	旋即被迫停刊，1928.7.15 復刊，終刊時間不詳 (現見最後一期為 1928.9.15 出版的第 6 期)
約 1927.11	《婦女》	天津	月刊	綜合性婦女讀物	僅見 1928.6.10 出版的第 2 卷第 2 期

《當代史學》第11卷第3期（2012年9月）

❖ 婦女史研究 ❖

2011 年出版中國婦女史著作八種介紹

丁　潔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

2011 年初以來，有關中國婦女史的專書相繼推出，坊間所見已有八種，反映了這方面的研究方興未艾。第一種是黃嫣梨著《巾幗何讓鬚眉——中國婦女史研究論集》，內容較多探討近代人物；第二種是夏曉虹著《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集中論述晚清時期的女性；第三種是林美玫著《婦女與差傳：19 世紀美國聖公會女傳教士在華差傳研究》，所述雖以外國女傳教士為主線，當中亦有不少篇幅關於近代中國女學、女子啓蒙等問題。三位作者，分別在香港、北京、台北從事研究；所著又從不同角度闡述近代中國婦女社會的變遷，一併介紹，大抵可以反映出婦女史研究的共通性和多元性。

鄧小南等主編《中國婦女史讀本》，是很重要的著作；張偉國著《巾幗列傳——從女媧到武則天》，介紹了數十位古代著名婦女；高世瑜著《唐代婦女》是舊著新編，增補了不少新的內容；最近得睹的兩種，是鐵愛花著《宋代士人階層女性研究》和沈雨梧著《清代女科學家》。總的來說，2011 年是中國婦女史研究豐收的一年。相信還有更多未能入手的新著，留待日後再作介紹。

❖ 黃嫣梨著《巾幗何讓鬚眉——中國婦女史研究論集》，香港：中華書局，2011 年。（298 頁）

本書是「中華文史專刊」的第八本，收錄了著者關於中國婦女史的十四篇研究論文。書首有題為〈從詩詞看中國婦女心態〉的代序，收錄文章大致上可以分為四類：（一）關於古代婦女的，有〈宋朱淑真詠史詩十首述評〉和〈晉代女子風範及其學養管窺〉；（二）關於清代婦女的，有〈轉型中的清代知識女性〉、〈徐燦的思想與傳統婦德觀念〉、〈從《于雲殘冊》看清代才女魏于雲〉；（三）關於近代婦女觀、婦女參政和文化人物的，有〈革新時期中國婦女新典範之建構——簡論梁啟超的「強國保種」和孫中山的「超賢妻良母觀」〉、〈呂碧城與清末民初婦女教育〉、〈陳婉衍與清末民初上海愛國運動〉、〈何香凝的大腳思想與婦女革新觀念〉、〈辛亥時期的參政急先鋒——林素宗〉、〈清華留美女歷史學家——北大教授陳衡哲〉和〈林徽因的愛國情懷〉；（四）其他婦女史題材，有〈東江女戰士訪問實錄〉、〈香港女性教育的發展與社會地位的遞變〉。

著者在〈後記〉中指出：「筆者寫這些文字，都是想表達一個信念：男子可以做的工作，女子一樣可為。」又說：「中國婦女生活史，是一部由妝台踏出妝台以外，是一部由依附男性步向巾幗英雄的歷史。這種步伐，這種轉換，是與時代並進的，也是歷史應有的必然發展。」順帶一提，著者的另一著作《妝台與妝台以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9 年）是本書的姊妹篇，內容可以與此書前後呼應。

❖ **夏曉虹著《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1 年。（317 頁）**

本書是著者在一些研討會中發表或準備發表的學術論文的結集，經過整理和編排，以女性問題作為透視晚清社會的窗口，通過七個個案的剖析，重構晚清圖景。書首有〈導言：重構晚清圖景〉，作者指出：「雖然本書的構想是以重新認識晚清社會為依歸，進入的圖景卻選擇了女性研究。理由無他，女子在社會現實中的處境遠較男子複雜，遭遇的困擾也遠較男性繁多。……身處晚清，男性涉及的社會問題，女子無一能逃脫，在此之外，女性更有諸多必須獨自面對的難題。因而，將女性的生存狀況作為衡量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標尺，確有道理。反過來說，對晚清女界生活與觀念的考察，也可以獲致全方位地呈現晚清社會場景的效果。」

正文分為上下兩篇：上篇「女性社會」，以個案整合的方式，映現晚清女性從生活形態到思想意識的新變，包括〈中西合璧的教育理想〉、〈新教育與舊道德〉、〈晚清女報的性別觀照〉及〈歷史記憶的重構〉四章；下篇「女性之死」，包括〈晚清女學中的滿漢矛盾〉、〈從新聞到小說〉及〈紛紜身後事〉三章，分別講述了滿族婦女惠興的自殺殉學、胡仿蘭的被逼服毒、秋瑾的被斬首，三人死亡方式各異，原因不同，由此引發的社會風波也帶有不同的意義指向。書末有〈主要參考文獻〉和〈初版後記〉。

❖ **林美玫著《婦女與差傳：19 世紀美國聖公會女傳教士在華差傳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年。（400 頁）**

書首有賴榮信主教和陶飛亞的兩篇〈序〉及作者〈自序〉，並有中英文摘要。作者指出，本書「是以 19 世紀美國聖公會中國差會女傳教士和她們在華的傳教工作為研究主體。由於美國聖公會是基督新教自 1807 年英國倫敦會馬禮遜入華以來最早的九個傳教團體之一，這使聖公會女傳教士在 19 世紀基督新教入華的宗教傳播及其所造成的中西文化衝擊上，自有其特殊意義與代表性。……在 19 世紀中葉以來中外條約護教權的保護下，女傳教士自成一種階級，向中美男性教牧、教會助手、中國男女信徒和非信徒展現『女子有才始是德』的性別力量。女傳教士將個人純正婦女意識及婦女性別空間的理念與運作，經由其職務更動和傳教行為，延伸和轉換到中國差傳環境來，也啓發了中國社會在跨越 20 世紀時對女教或婦學傳統進行必要的改革。」

正文分為八章：（一）〈研究引論〉；（二）〈虔敬摸索：女傳教士工作與展現美國「純正婦女意識」〉；（三）〈性別空間：性別空間概念用於新教女傳教士研究的初探〉；（四）〈異域差傳：女傳教士工作在種族、性別與階級上的意涵〉；（五）〈教會女學：女傳教士與聖公會上海聖瑪利亞女學的建立〉；（六）〈女子啓蒙：女傳教士與性別空間概念的延伸、轉換與啓發〉；（七）〈所傳為何：女傳教士工作是女性特質的傳接或女性主義的導引〉；（八）〈性別對話：19 世

紀中美婦女在宗教-性別-文化上的對話〉。書末附錄〈美國聖公會傳教士生平簡錄〉、〈人地名字詞中英對譯表〉及〈參考書目〉。

❖ **鄧小南、王政、游鑑明主編《中國婦女史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426 頁）**

本書匯集中、外關於婦女史的論文，以通史方式編纂而成，書首有〈寫在前面的話〉和游鑑明的〈導言〉，收錄論文共十九篇。古代史部分計有：楊聯陞〈中國歷史上的女主〉、高世瑜〈《列女傳》演變透視〉、李貞德〈女人的中國中古史——性別與漢唐之間的禮律研究〉、劉靜貞〈歷史記述與歷史論述——前後《漢書》中的王昭君故事辨析〉、吳一立〈鬼胎、假妊娠與中國古典醫學中的醫療不確定性〉、陳弱水〈初唐政治中的女性意識〉、柯素芝〈修行與轉變——唐代道教女仙生活中的身體和實踐〉、柳立言〈淺談宋代婦女的守節與再嫁〉、高彥頤〈「空間」與「家」——論明末清初婦女的生活空間〉、曼素恩〈從宗族、階級和社區結構來看清代寡婦〉；近代史部分計有：楊興梅〈觀念與社會——女子小腳的美醜與近代中國的兩個世界〉、胡纓〈九葬秋瑾——歷史紀念與公共記憶的製造〉、鄭永福、呂美頤〈關於近代中國「女國民」觀念的歷史考察〉、曾佩琳〈身在衣外——晚清上海的時尚和認同〉、連玲玲〈「追求獨立」或「崇尚摩登」？——近代上海女店職員的出現及其形象塑造〉、許慧琦〈過新生活、做新女性——南京國民政府對時代女性形象的塑造〉、胡曉真〈閨情、革命與市場——由民初彈詞小說家姜映清談起〉、呂芳上〈革命與戀愛——1920 年代中國知識分子情愛問題的抉擇與討論〉、林郁沁〈公眾的形成——1930 年代中國的情感與媒體炒作〉。游鑑明在〈導言〉中指出：「綜括來說，在這 19 篇論文中，有三項研究趨勢值得注意：一、以婦女為分析範疇在本書佔多數，也有論者把男性列為研究或比較的對象，擴大了性別研究的視角；二、以女教書、刑律、貞節觀、纏足規範婦女或以國家意識、政黨政策、媒體輿論框限婦女，固然是既定事實，並被論者認同；然而，論者們也認為所有規範或限制並不絕對存在，無論傳統或近代都出現鬆動，他們為婦女的自主性找到新的詮釋；三、除從女性世界去探究婦女問題之外，許多論者也注意到政治。經濟或社會變遷，如何影響婦女，讓婦女研究有更多參照面，不流於獨白。」

❖ **張偉國著《巾幗列傳——從女媧到武則天》，香港：中華書局，2011 年。（202 頁）**

本書是著者在香港電台主持廣播節目《巾幗列傳》的講稿，並增寫隋唐部分而編成的，總共有三十二篇，介紹了三十多位古代著名女性。為首兩篇是〈女媧：傳說中的女祖先〉和〈月中仙子話嫦娥〉，先從傳說講起；先秦時期婦女，計有娥皇和女英、婦好、妲己和褒姒、孔子和孟子兩位聖賢的母親、傳說中的第一醜女鍾無豔、傳說中的第一美人西施、男人權力場中的趙姬；秦漢時期的婦女，有巴郡寡婦清、孟姜女、呂后、孝女緹縈、漢武帝身邊的女人、卓文君、漢宮女性王政君和王昭君、鄧綏、亦假亦真的絕代美人貂蟬、蔡文姬、甄夫人；接著是晉代翻雲覆雨的賈南風、六朝金粉莫愁和蘇小小、北魏后妃、嶺南女傑冼夫人，北周大將獨孤信的三個分別成為北周、隨、唐三朝皇后的女兒；隋唐時期的婦女，有隋煬帝蕭皇后、揚名異域的文成公主、唯一的女皇帝武則天、三千寵愛在一身的楊貴妃、大唐盛世多情妓女霍小玉。

著者在〈序〉中指出：「傳統的女性，絕大多數一生相夫教子，操勞家務，有些婦女更擔當了農事、紡織等生計，卻無緣於政治、軍事、文化，因此甚少在正史中立傳，她們甚至連名字也沒有留下。這半邊的歷史，被歷史記述所隱沒，然而，她們的確存在，而且為中國的文明進步作出了沉默卻巨大的貢獻。事情總有例外，一些傑出的古代女性，在男性主導的社會中，爭取得一席之地，凸顯了歷史地位，因而記述於史冊，或者受到社會的傳誦。她們有些憑丈夫而顯貴，因而有機會挑戰男權；有些因糾纏在男性圈中而受注視，成為歷史的角色。在男性主導的記述之中，無論對她們是讚揚還是責備，都是難能可貴的。」

❖ **高世瑜著《唐代婦女》，西安：三秦出版社、陝西出版集團，2011 年。（331 頁）**

本書是「大長安書系」中的一本，也是 1988 年同名書籍的再版，保持了原版的基本框架，增補了一些新內容，並對章節稍作變動，使其更加合理。作者在〈引言〉中指出：「唐代婦女史業績卓著又獨具特色的一代女性。她們中有詩人才女，有書畫妙手，有樂舞名家，有絕技藝人，有能工巧匠，有馳騁沙場的巾幗英雄，有揭竿造反的草莽女傑，更有一位威勢赫赫、千古一人的女皇帝，當然還有千千萬萬默默地創造著社會財富，盡著母親、妻子職責的普通勞動者。在中國古代史冊中唐代那最輝煌絢爛的一頁上，有著她們不可磨滅的光彩。」〈引言〉之下分為五章：第一章〈唐代婦女社會面貌概說——一個非凡女性引起的思考〉，從女皇武則天入手，概述了唐代的社會風氣和婦女地位；第二章〈婦女群體狀況〉，下分八節，分別介紹宮廷婦女，皇族婦女（公主附郡、縣主），貴族、宦門婦女，平民婦女，娼妓、優伶，姬妾、家妓，奴婢，宗教職業婦女；第三章〈婦女才藝與業績〉，下分四節，探討了婦女與文學，婦女與藝術，婦女與政治，婦女與科技；第四章〈婦女生活與習俗〉，下分八節，分述婦女教育與女教著述，婚姻、情愛與性，家庭生活與倫理，生育觀念與風俗，社交與結社，娛樂競技活動，宗教信仰與活動，服飾與妝飾；第五章〈有關婦女的法制與觀念〉，分兩節闡述有關婦女的法律制度以及女性觀與道德觀；最後是〈原版結語〉和〈再版後記〉。

❖ **鐵愛花著《宋代士人階層女性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年。（384 頁）**

書首有王曾瑜的〈序〉。著者在〈導言〉中提到：「本書擬從秩序、規範與女性的實際生活入手，按照從社會到家庭、個人三個層面的邏輯順序進行組織，以期從多角度、多層面透視宋代社會秩序、規範與士人女性生活之間的關係，考察宋代士人階層女性與國家、士人、民眾以及家庭等之間的互動，從而更為深入與客觀地認識宋代士人階層女性的生活實然，把握當時社會的時代特色。……在本書中，一方面我們試圖從陰陽學說、國家制度、士人社會、地方鄉里、士人家庭等層面，考察宋代秩序、規範如何對士人階層女性的生活產生影響；另一方面，我們也試圖揭示宋代社會秩序、規範對女性生活的影響程度。由於社會、家庭及女性自身等因素的影響，宋代士人階層女性的生活大大超越了理想秩序規範的期許，呈現出豐富多元的特色。」

正文分為上下兩篇：上篇「秩序、規範篇」，包括第一章〈陰陽學說與宋儒理想的性別秩序〉、第二章〈宋代性越軌法律與旌表制度對性別秩序的規範〉、第三章〈宋代社會輿論對性別秩序的規範〉、第四章〈宋代士人家庭對性別秩序的規範〉；下篇「女性生活篇」，包括第五章〈宋代士人階層女性在公領域的活動〉、第六章〈宋代士人階層女性的閱讀活動〉、第七章

〈宋代士人階層女性的休閒活動〉、第八章〈宋代士人階層的夫妻關係與妻妾關係〉，最後有〈結語〉。書末附有〈主要參考文獻〉及〈後記〉。

❖ **沈雨梧著《清代女科學家》,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 年。(243 頁)**

書首有李蘭娟及王冰的〈序〉。著者在<前言>中提到：「收入本書的女科學家活動的時間範圍從明末清初至清朝滅亡。……文中對立傳的女科學家的生平，和她們對某一學科的主要貢獻、代表作，及其發明或成果，都作簡要介紹。各篇都配有人物肖像（畫像或照片）及其所著書署名或書中重要內容的書影。……收入本書的女科學家，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能積極從事科學技術活動的女性，大多家人比較開明，家庭環境優越，自幼接受良好的教育，同時又受到父、兄或丈夫科學研究的影響，而且本人對科學技術研究有濃厚的興趣。……第二類是奮戰在生產第一線的勞動婦女，盡管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但她們在生產實踐中的科技發明或技術革新，往往直接推動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她們生產的有的產品還成了世界名牌，增加了國家的外貿收入。」正文介紹了 28 位女科學家，包括〈青年科學家王貞儀〉、〈王錫蕙與她的《樹百算學》〉、〈聞名長江三角洲的「定娘子布」〉、〈製造小巧玲瓏自鳴鐘的孫細娘〉、〈造天文望遠鏡的光學家黃履〉、〈才華卓越的著名中醫曾懿〉、〈名醫郭琬母親吳氏、妻子毛氏的祖傳《牡丹十三方》〉、〈清代第一位女西醫金雅妹〉、〈終身服務醫療事業的張竹君〉、〈天津女醫院掌門人曹麗雲〉、〈參加辛亥革命的女醫師梁煥真〉等等。另有〈附傳：開創廣州女醫院的富瑪利〉，介紹了一位美國傳教女醫師。附錄有〈清代女科學家研究成果統計簡表〉、〈清代女科學家首創品牌和中國女界第一統計簡表〉、〈各種辭典收入清代女科學家統計簡表〉、〈沒有收入本書正傳的清代女科學家〉、〈有關清代自然科學的人與事〉及〈外國人記載的清代勞動婦女的科技發明與創造〉。書末有〈主要參考書目〉和〈後記〉。

《當代史學》第11卷第3期（2012年9月）

❖ 書　評 ❖

李金強著《一生難忘——孫中山在香港的求學與革命》評介

文兆堅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

書　　名：一生難忘——孫中山在香港的求學與革命
作　　者：李金強
出 版 地：香港
出版機構：孫中山紀念館
出版年份：2008
頁　　數：196

晚年的孫中山在香港大學發表演說，坦承香港是其革命思想或新思想的發源地，他說「我本未預備演說，但願答覆一問題，此問題即前此屢有人向我提出，而現時聽眾中亦必有許多人欲發此問者。我以前從未能予此問題以一相當答覆，而今日則能之。問題維何？即我於何時及如何而得革命思想及新思想是也。我之此等思想發源地即香港。」有學者具體地說明香港對孫中山的影響，指出「孫中山一生的事業和香港有過甚深的姻緣。孫中山的青年時代在香港渡過。他的正規西方教育也是在香港完成的。自一八九四年興中會成立以來，孫中山領導和策劃的反清革命活動，每多以香港為重要基地。一九零五年同盟會成立以後，香港更成為同盟會南方支部的所在地。可以說，在辛亥以前，香港與孫中山的革命事業幾乎維持著最密切的關係。」（林啟彥：〈近三十年來香港的孫中山研究〉，孫中山研究會編：《回顧與展望——國內外孫中山研究述評》，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534。）孫中山是近代中國人物研究中的一門顯學，研究著作多不勝數，部分著作以孫中山與香港為研究主題，《一生難忘——孫中山在香港的求學與革命》正是最近這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

作者在〈序言〉中交代了撰寫本書的源起和研究範圍，就是「關於香港與孫中山及辛亥革命的關係，孫中山及其同時代革命黨人如馮自由等早有記述，而中外學者亦相繼研究，然多以論文為主，尚少成書。二零零四年香港特區政府計劃成立孫中山紀念館，隨即委託筆者從事《香港在近代中國史上的角色》此項研究計劃，作為該館展覽內容之依據。而本書即為此一研究計劃中的部份研究成果，全書透過對孫中山同時期師友記述及革命史料的探尋和辨析，重構孫中山在港生活及革命活動之歷程。進而探討香港在清季革命運動中的角色，為香港與近代中國歷史關係，提供較為清晰的歷史圖像，使此一孫中山與香港的集體記憶得以重見於現今。」（頁 7）繼〈序言〉後，本書另有五章。第一章〈史料篇：孫中山及其師友關係〉

利用多項史料，計有楊襄甫〈區鳳墀先生傳〉、尹文楷〈二十五年來之香港教會〉、王寵惠〈追懷國父述略〉、康德黎（James Cantlie）文件、簡又文〈國民革命文獻叢錄〉和〈國父的青年時期〉、鄭子瑜〈總理老同學——江英華醫師訪問記〉、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要》、尤列〈楊衢雲略史（中國革命興中會最初之實錄）〉、劉成禺〈先總理舊德錄〉、劉學詢〈總理史實訪問記〉，「重探孫氏與其師友的關係，包括牧執師長區鳳墀、王煜初、康德黎；同學關景良、江英華、陳少白；朋輩尤列、楊衢雲、劉學詢等九人，藉此使吾人瞭解孫中山在香港時期的革命思想與活動之所由起。」（頁 10）

第二章〈求學篇：孫中山的成長歷程〉探討孫中山投身反清革命運動前的經歷。1866 年，孫中山在廣東省香山縣翠亨村出生，出身於一個務農家庭。香山位於珠江三角洲的南部，與廣州、澳門、香港三地接近。當時香山人口繁多，土地供應不足，不少人移居海外謀生，孫中山的兄長孫眉就在夏威夷檀香山工作。孫中山在香山接受傳統啟蒙教育，1879 年他隨母親經澳門前往檀香山，投靠其兄長，在意奧蘭尼學校（Lolani School）和奧阿厚書院（Oahu College）接受小學、中學教育，開始吸收西方知識，並對基督教產生信仰，打算受洗入教，遭到孫眉反對，於 1883 年將孫中山帶回香山。孫中山不滿香山居民的宗教迷信和偶像崇拜行為，與他們發生衝突，結果孫中山被迫在同年來到香港，求學於拔萃書室（Diocesan Home and Orphanage）、中央書院（The Government Central School），其間受洗成為基督教徒。1886 年在中央書院畢業，轉往廣州博濟醫院（Canton HospitalHo）所設的醫校。翌年重回香港，在香港西醫書院（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kong）修習醫學，1892 年以優異成績畢業。畢業後在澳門、廣州行醫。1894 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孫中山前往北京，向清廷大臣李鴻章上書，被李鴻章拒絕接見，孫中山感到十分失望，決定放棄行醫，繼後成立興中會，展開了反清革命運動。孫中山在香山、廣州、香港、澳門生活期間，認識了陸皓東、喜嘉理牧師（Rev. Charles Hager）、區鳳墀、王煜初、康德黎、何啟、鄭士良、尤列、陳少白、關景良、楊鶴齡、楊衢雲、飛南第（Francisco H. Fernandes）等人，部分對孫中山的革命事業，提供了莫大的幫助。本書作者認為探討孫中山一生，不能不注意廣港澳三地對孫中山的影響，其中「尤以香港最為關鍵」，原因是「孫氏在香港，不但獲得了信仰與專業知識，並從而產生其政治革新思想與理念，此後從事組黨、籌款、宣傳、購買軍火，以至策動武裝起義，均以香港為大本營。故香港實為孫中山革命思想的搖籃，以及革命運動的主要基地，而香港亦由是取得近代中國革命史上的中心地位。」（頁 48）

十九世紀下半葉，香港社會出現了一批華人精英，第三章〈改革篇：香港華人與清季革命運動的醞釀〉論析他們的思想與行為。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於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後，來到當地開展宣教事業，該會的華人信徒決定自立，於 1888 年建立了道濟會堂，是本港第一間華人自立教會。王煜初、區鳳墀是道濟會堂的重要人物，本章論述王、區二人在服務香港、改良中國上的主張和表現。作者強調道濟會堂對孫中山思想成長的影響，他指出「道濟會堂的教牧及信徒，實為十九世紀下半葉香港倡導改革言論『重鎮』之一。而更重要則為青年時期的孫中山，於 1883 年冬受洗信教後，常至道濟會堂參加聚會崇拜，……期間孫氏的信仰與革新思想，無疑以道濟會堂為其淵藪。」（頁 83）除王煜初和區鳳墀外，王韜、何啟、胡禮垣、孫中山亦提出改革中國的建議，作者分析王韜的「變法自強」論、何啟和胡禮垣的「新政」論、孫中山的「農業改良」論。部分香港華人精英成立若干團體或組織，進一步推動中國革新。楊衢雲、謝纘泰等在 1892 年成立輔仁文社，該社性質是「敦品修

學的愛國改革團體」。（頁 91）此外，孫中山於 1891 年創設少年會，並且與陳少白、尤列、楊鶴齡、關景良互相往還，其中孫、尤、陳、楊四人經常聚會於楊鶴齡的祖業楊耀記商號，暢談反抗滿清，人們稱四人為「四大寇」。孫中山透過尤列，認識了楊衢雲。日後孫中山成立興中會，策劃反清武裝起義，楊衢雲、謝纘泰及其輔仁文社亦作出支持。值得注意的是，道濟會堂、輔仁文社、香港興中會分會，加上香港華人精英所建立的組織，如文武廟、東華醫院、《華字日報》和《循環日報》報社，均集中於香港島的上環，因此作者形容上環是十九世紀中國變革運動中的「啟蒙明燈」。

作者認為香港在近代中國革命史上佔中心地位，書中第四章和第五章論述香港與近代中國革命的關係。第四章〈革命篇（上）：香港興中會總會的成立及其武裝起義（1895~1905）〉指出 1894 年 11 月 24 日孫中山於檀香山成立興中會，翌年 2 月 21 日舉行香港興中會總會成立大會，隨即策劃廣州起義，這次起義史稱「乙未廣州之役」。孫中山、楊衢雲二人計劃在 10 月 26 日重陽節的時候，乘掃墓人多的機會，在廣州發動起義。楊衢雲在香港購買軍火和招募群眾，孫中山在廣州爭取士紳支持。起義經費方面，主要依靠與楊衢雲有關係的黃詠商和余育之資助。起義策劃期間，香港《德臣西報》（*China Mail*）刊載多篇抨擊清廷的文章，何啟亦匿名投稿，要求中國實行新政，與《德臣西報》一齊為起義造勢。楊衢雲在起義前夕，擔任興中會會長。重陽節當日，由於軍火未能及時來到廣州，加上群眾拒絕參加起義，廣州起義流產失敗。1900 年庚子拳變爆發，中國局勢混亂，孫中山決定再次起義，史稱「庚子惠州之役」，發生時間是 1900 年 10 月 6 日，維持了接近三個星期。這次起義的經過，作者表示「綜觀惠州一役，籌劃經年，前後起義接近三週，起義軍四戰四捷，終因彈藥不繼而告失敗。而史堅如則於廣州進行暗殺活動，藉此牽制，亦告失敗而犧牲。而此一以孫中山為首，借英、日外國勢力，即依賴香港總督卜力、日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以至兩廣總督李鴻章的權勢，又聯合會黨藉以發動革命，由東京首起，穿梭香港、西貢、星加坡、上海、台北各地，進行遊說活動，密謀佈置。最終於香港設立大本營，作為策動中心，而以三洲田及廣州兩處為起義地點之惠州一役，至此全盤失敗。」（頁 121）1901 年楊衢雲被清廷暗殺，楊的好友謝纘泰為了報仇，與洪秀全從侄洪春魁（洪全福）合作，在 1903 年農曆除夕於廣州聚眾起義，然而事情泄露，起義之火遭清廷撲滅，該起義稱為「壬寅廣州之役」。經過了三次起義，興中會元氣大傷，運作幾乎陷於停頓，不過「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孫中山與其他革命團體聯合，於 1905 年成立了中國同盟會，反清革命運動步向一個新的階段。

第五章〈革命篇（下）：同盟會時期香港於革命運動中角色的探討（1905~1911）〉表示同盟會於 1905 年在東京創立，同年 10 月 16 日成立香港同盟會分會，會址設於《中國日報》社社長室，負責西南各省的軍務和黨務，還有南洋、美洲各地的交通事務。香港同盟會分會是東京本部以外首設的地方分會。該分會成立以後，先後有三人擔任會長，分別是陳少白、馮自由、謝英伯，其中以馮自由任職時間最長，並作出最大貢獻。由於黨務日漸繁重、黨員不斷增加，分會感到非常吃力，會員於 1909 年 8 月決定創立南方支部。香港分會保留，繼續主持香港和澳門兩地會務，南方支部則全權負責統籌華南各省黨務、軍事、宣傳、聯絡及一切前線工作。在策劃武裝起義方面，南方支部、香港分會分別肩負策劃軍事行動和經費籌募。南方支部部長由胡漢民擔當，會址在灣仔鵝頸橋。孫中山及東京本部於 1909 年 9 月公認南方支部，南方支部正式成立，支部經費由香港會員負責。繼支部後，革命黨人黃興、趙聲等在 1911 年 1 月建立統籌部，總部位於香港跑馬地。香港同盟會分會、南方支部、統籌部發動多

次「邊區革命」，所謂「邊區革命」，就是「其一以香港為基地，策動廣東潮、惠起事；其二則以河內為基地，策動滇、粵、桂三省邊地起事。」（頁 147）這些革命包括：潮州之役（1907 年 2 月 19 日）、黃岡之役（1907 年 5 月 22 日）、惠州七女湖之役（1907 年 6 月 2 日）、欽州防城之役（1907 年 9 月 4 日）、鎮南關之役（1907 年 12 月 1 日）、欽廉上思之役（1908 年 3 月 27 日）、雲南河口之役（1908 年 4 月 30 日）、廣州新軍之役（1910 年 2 月 10 日）、廣州黃花崗之役（1911 年 4 月 27 日）、廣東光復之役（1911 年 11 月 9 日）。除鎮南關及河口兩役外，其餘八次武裝起義無一不與香港有關。香港不僅是革命資源的集散地，並且成為革命黨人的避難所。至於香港黨員的貢獻，作者表示「香港黨人於清季革命運動中，於武裝起義一環，運籌帷幄，決策於先；繼而提供人力、財力、物力，使起義得以付諸行動；而最終仍能於起義失敗後承擔善後之責，使軍事行動得以維繫持續。」（頁 164）書末附有〈參考書目〉。

追溯香港學者的孫中山與香港關係研究，始於上世紀七十年代。香港大學教授羅香林先後出版了《國父之家世與學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2 年）、《國父在香港之歷史遺蹟》（1971）（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02 年，重印）。吳倫霓霞則編輯了圖片集《孫中山在港澳與海外活動史蹟》一書（廣州、香港：中山大學孫中山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1986 年）。自此以後關於孫中山與香港研究的學術書籍未見出版，二十多年後本書面世出版，它打破了這方面研究出版長期沉寂的局面，因此該書出現實在具有重大的意義。翻閱本書的〈參考書目〉，看到作者使用不同類型的資料，包括：中外原始文獻、殖民政府檔案、海內外學者著作。由於資料豐富，所以書中內容十分充實。有學者表示羅香林、王德昭、吳倫霓霞和霍啟昌是推動孫中山與香港關係研究的重要香港學者，認為羅香林「以史料整理及掌故考訂見長」，王德昭「長於對中山先生思想演變的分析」，而吳倫霓霞和霍啟昌則在史料運用有所突破，利用港英政府的殖民地檔案、英國政府的外交部檔案和香港早期的報刊雜誌作出探討。（林啟彥：〈近三十年來香港的孫中山研究〉，孫中山研究會編：《回顧與展望——國內外孫中山研究述評》，頁 536–537。）本書既有孫中山與同時代人物關係的考訂，又有對孫中山農業改良思想的分析。與此同時，也使用殖民地部（Colonial Office）檔案、香港早期的英文報章如《德臣西報》（*China Mail*）、《孖剌西報》（*Hong Kong Daily Press*），論述孫中山在香港的求學與革命活動。由此可見，本書集眾學者研究之長，綜合性相當強。

不過，在〈參考書目〉內的「中文論文」部分，作者列舉了徐興慶〈戊戌維新時期における中日交流史——劉學詢の日本を派遣中心に〉一文，這篇文章應該是用日文撰寫的，它並非中文論文，因此作者將該文置於「中文論文」部分並不恰當。此外，在「中文論文」部分提到〈「國父」形象的歷史形成〉、〈胡漢民致孫中山、馮自由函〉、〈香港早期西醫書院及其在醫術與學術上的貢獻〉、〈關於孫中山的大學時代〉、〈曾論書後〉、〈新政論議〉等文章，但是未有交代這些文章的作者，實在令讀者感到疑惑。最後，作者完成本書後，繼續孫中山與香港的研究，撰寫了〈再論孫中山的大學時代（1887–1892）〉、〈從省港澳地域觀察孫中山的求學與革命〉、〈孫中山與四大寇〉、〈中山革命思想的緣起〉等論文，期望作者再接再厲，圍繞孫中山與香港這個研究主題，寫出另一本書籍，使香港學者在這方面研究的發展可以「更上一層樓」！

《當代史學》第11卷第3期（2012年9月）

❖ 書　評 ❖

王德昭著《孫中山政治思想研究》評介

文兆堅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

書　　名：孫中山政治思想研究
作　　者：王德昭
出 版 地：香港
出版機構：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出版年份：2011
頁　　數：327

在評介本書內容前，讓我們認識該書作者的生平及其經歷。王德昭教授（1914–1982）是浙江嘉興人，家境清貧。幼時在私塾學習，後來插班到新式學堂，以一年半時間讀畢小學。繼後在布店當學徒。1930 年考入杭州的浙江省立民眾教育實驗學校師範科，畢業後前往北京求學，在中法大學化學系肄業一年，1934 年轉入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在學期間靠賣文來維持生活，並參加 1934 年的「一二・九」學生運動。1937 年 7 月，蘆溝橋事變發生，中國與日本全面開戰，抗日戰爭爆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合組臨時大學，在湖南長沙開課，王德昭從家鄉輾轉至長沙就讀，同時又在《觀察日報》擔任編輯，每天休息時間只有兩三小時。隨著南京淪陷，臨時大學決定西遷雲南昆明，成立西南聯合大學。王德昭隨校西遷，徒步從長沙出發，經貴州到達昆明。大學畢業以後，先後任職中學教師、重慶《益世報》編輯、河南省三一出版社社長和兼辦《華中日報》。1942 年轉往貴州大學歷史系任教。五年後東渡台灣師範大學，執教歷史學系。1955 年遠赴美國哈佛大學深造，獲取碩士學位。1962 年接受新加坡南洋大學歷史系的聘請，先後擔當系主任、文學院院長和校務行政委員等職位。四年後執教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系。從一九六六至一九七七年間，在中文大學擔任歷史系主任、中國文化研究所副主任、文學院院長，並且主編《中文大學學報》和《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1977 年退休以後，任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後來因患腦溢血症而與世長辭。王德昭教授學貫中西，尤長於中西交通史、西洋史及史學理論、明清及中國近代史研究，中英文著作等身，專著包括：《明季之政治與社會》（1942）、《中原歸來》（1943）、《怎樣教歷史》（1951）、《文藝復興》（1953）、《國父革命思想研究》（1962）、《西洋思想史》（譯著，1963）、《清代科舉制度研究》（1982）、《西洋通史》（1987）。此外，也有《從改革到革命》（1987）和《歷史哲學與中西文化》（1992）兩本論文集。

《孫中山政治思想研究》一書前身是《國父革命思想研究》，1962 年由台灣的中國文化研究所出版，重新出版原因是推動讀者對孫中山思想和辛亥革命的了解。書首有陳萬雄的〈導讀〉，簡單介紹本書內容，它「由兩篇長論文組成。一是〈同盟會時期孫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分析研究〉；一是〈孫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分析研究〉。前者是研究分析孫中山早期的革命思想的發展；後者是研究分析孫中山思想形成後的思想系統和特點。兩者相輔相成，互為補足。全面揭示了孫中山思想的中外來源、發展過程、內容要點、理論系統、時代特徵以至實行的成效等，是一本研究孫中山革命思想體大思精之作。」（頁 ii）以下再詳細闡明書中內容。

〈同盟會時期孫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分析研究（1903 年至 1911 年）〉分為九節。第一節開宗明義強調同盟會時期是孫中山革命思想形成的最關鍵時期，作者表示「同盟會時期是孫中山先生革命思想大成的時期，也是他開始具有信念，相信革命的大業可以及其身而成的時期。在這時期中，他發表了三民主義學說的綱領，開始討論五權憲法，並擬具了一個層次井然的革命進行的程序，以後習稱『革命方略』。」（頁 2）至於探討同盟會時期前孫中山思想的主要史料，分別是〈上李鴻章書〉、宮崎寅藏《三十三年的夢》和興中會宣言。第二節交代同盟會時期孫中山革命思想的年代斷限，就是「起自癸卯（光緒二十九年；1903 年），這一年中山先生開始以其後同盟會的誓詞——『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來吸收革命黨員；而止於辛亥（宣統三年；1911 年），這一年武昌起義，中山先生自美國經歐洲返華，被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頁 6）興中會於 1900 年發動反清武裝起義，即庚子惠州之役，以失敗告終。從 1900 至 1903 年間本來支持興中會的會黨和海外華僑，不少轉投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保皇黨。革命黨員開始檢討應否以會黨作為革命運動的中心力量。與此同時，由於滿清政府的威信掃地、新教育和新知識的灌輸，加上反滿書刊的出版，激發中國知識分子尤其是留日學生的民族意識，對革命運動產生憧憬。孫中山決定以知識分子取代會黨，作為革命的主力，一個以知識分子為中心的同盟會因而誕生。與興中會比較，不論是宗旨和組織成分，同盟會毋疑是新的革命組織。作者亦兼論孫中山當臨時大總統期間對時局未能有效控制的原因。首先，武昌起義後的同盟會和民初的國民黨，由中部同盟會控制，該會與孫中山關係並不密切。此外，武昌起義後，南北和議展開，繼後清帝遜位，袁世凱成為總統，孫中山表現被動，反映孫中山的影響力有限，因此未能有效控制時局。

第三節強調「同盟會時期雖是中山先生革命思想大成的時期，但他的若干主要的思想條理，已可在這時期以前的他的言論著作中見之。」（頁 24）這主要的思想就是主知主義，一種本於以知為行的主宰的信仰，它的產生源於其知識優越感，這種感覺的發生與他早年經歷有關，作者表示「在辛亥前中山先生倡導革命的期間，革命領導者（乃至康、梁黨人）而曾自少身受西式教育，接受嚴格的科學訓練，直接閱讀西文書籍，並曾親接歐美的文化社會者，中山先生幾屬唯一的一人。他既見中國應該取法乎上，步武泰西，以從事革命建設，以己之知比國人之無知，則自然發生一種知識優越感，一旦與實行革命的決心相結，遂形成一種主知主義的思想，而為他後來完成的知行學說所本。」（頁 36）除主知主義外，孫中山在同盟會時期還發表了「革命方略」，指出中國要實現民主立憲，必須經過軍法之治、約法之治、憲法之治三個階段，此即「革命建國三時期」。本文第四節論述「革命建國三時期」的具體內容，有人對約法之治作出批評，作者則認為約法之治必須實行，原因是「一個經過長期專制統治的國家，人民的知識程度低下，政治興趣薄弱，政治常識和修養缺乏，在這樣一個國家，而在推翻專制政府後便立刻實施憲政，把國家權力完全交付給人民，自然十分危險。」（頁 49）

此外，在主知主義的影響下，孫中山強調先知先覺者的重要性。由先知先覺者帶領群眾，實行約法之治是理所當然的。針對約法之治不能夠使中國步向民主法治的批評，作者相信只要約法之治以革命主義為指導思想，而革命主義得到廣大民眾的支持，加上在推行約法之治期間，切實進行地方自治，增加人民的政治權力，那麼約法之治一定可以推動中國政治走向民主法治。因此作者肯定革命方略，認為「他至少為中國民主憲政的建設，提供了一個合乎實際的程序和一種保障的制度。」（頁 55）然而由於南北和議向袁世凱作出妥協，還有袁世凱政府的倒行逆施，使孫中山的革命方略在民國初年未能正式實行。

接著是第五節，該節討論了同盟會時期孫中山的「革命民權」和「五權憲法」思想。革命民權方面，「雖早萌蘖於同盟會時期，中山先生的全部民權理論，則當時尚未發展完備」、「他曾主張以縣為單位的地方自治，但除選舉權外，也尚未曾提及『四權』中的其他三權（罷免、創制、複決）。」（頁 61）五權憲法方面，則「未曾立政權和治權的分際，因也沒有討論權能的區分」、「四權的理論既未完備，五權憲法中在行政、立法、司法三權之外，新增的考試、監察二權，也似乎意在制衡的作用為多。」（頁 62）本節亦分析孫中山將考試權、監察權獨立於行政、立法、司法三權的原因。雖然孫中山堅持先知先覺者的重要性，對真平等與假平等作出區別，並觸及「多數專制」的問題，不過作者相信孫中山是一個民權主義者，其「理想乃在實現真正的民權和自由。」（頁 66）同時作者亦談談五權憲法中考試權的實施情況。

至於第六節和第七節則探討孫中山的民族主義產生背景及其內容。第六節指出「在同盟會成立前後的數年中，排滿革命的思想真如狂潮。」（頁 70）作者以《蘇報》、留日學生、國內學潮、秦力山和保皇黨為例，藉以具體闡明。排滿革命思想形成狂潮的原因，一方面是《新民叢報》、《革命軍》、《黃帝魂》、《孫逸仙》和《猛回頭》的宣傳影響所致，另一方面是列強對中國的壓迫。正如作者所說「種族之義一經揭明，而又怵於當時列強的侵略，於是一種亡國之痛，遂深入於人心，發而為激烈的種族之思和排滿主張。」（頁 78）在排滿革命思潮的推波助瀾下，孫中山「被視為民族主義的精神和行動的領袖。」（頁 79）第七節談談孫中山的民族主義特色，就是以推翻滿清為目的，沒有排滿主義和排外主義的成分。作者根據孫中山的〈支那保全分割合論〉和〈中國問題之真解決〉（The True Solution of the Chinese Question）兩篇文章，分析孫中山在中國如何自保、中國會否被列強分割等問題的看法。二十世紀初，保皇黨與革命黨展開了鬥爭，雙方分別創辦《民報》和《新民叢報》，互相進行論戰。該節交代了雙方的論點，指出「以當時與《新民叢報》的思想鬥爭而言，則勝利無疑屬於《民報》。」（頁 103）不僅是思想鬥爭方面，即使是行動實踐上，革命黨也壓倒保皇黨。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由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三個部分組成。第八節探討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青年時期的孫中山已萌生民生思想，經歷倫敦蒙難以後的一段時間，這方面思想進一步發展，形成了民生主義。「平均地權」是民生主義的核心，在穆勒、亨利・喬治（Henry George）和土地國有論者等的影響下，平均地權內容包括地租歸於國家、土地自然增價歸公、土地國有、照價納稅。除平均地權外，孫中山還主張運用外資、國家社會主義。作者認為民生主義具有防患於未然的精神，既求經濟的進步，避免經濟的進步成為社會災害的禍階，又消弭社會革命，使國家毋須經歷資本主義的災害和社會革命的痛苦，直接登上社會主義的至福之境。最後第九節指出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西方不同思想紛紛傳入中國，計有進化論、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虛無主義、共產主義、自由平等思想，它們對孫中山構成影響，而孫中山對它們進行了選擇，並與中國思想精神作出調合，形成自己的思想，因

此作者認為孫中山思想有創造性的一面。作者以三民主義、孫中山對進化論和社會主義的看法，顯示孫中山思想的創造性。本節也論析三民主義的實踐情況，認為「辛亥革命成就了民族主義的革命，但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的主張，則未能有所建樹。」（頁 142）原因既有三民主義具有理想成分，但更重要是沒有認真實行的機會，作者說「但就中山先生思想的本身言，則它在民初的失敗，尚非失敗於它的不能實行，而是失敗於它的未曾獲得一個認真實行的機會。」（頁 142）

〈孫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分析研究（1912 年至 1919 年）〉分為七節。第一節論析孫中山在民初未能有效地控制時局，其革命思想沒有全面實踐的原因。辛亥革命與中部同盟會關係密切，宋教仁是中部同盟會的領導人物，在宋教仁的影響下，同盟會與其他政治團體合併，1912 年改組成為國民黨，該黨主張責任內閣、兩黨政治、以省為自治團體、三權分立、不重視民生問題，完全有異於孫中山所提倡的革命方略、以縣為自治單位、五權憲法和民生主義。與此同時，民國建立後的革命黨濫收黨員，步向分裂。由此可見，孫中山無可能透過民初國民黨或革命黨施展其抱負。此外，亦與袁世凱的破壞有關。由於袁世凱握有重兵、革命黨軍力薄弱，加上局勢混亂，孫中山同意將民國政權交給袁世凱。在宋教仁被殺前，孫中山支持袁世凱政府，皆因是相信袁世凱可以使中國達致和平、肯定他的能力和政治經驗、認為憲法和國會等可以約束他，還有覺得袁世凱是能夠為善。宋教仁被殺後，孫袁二人正式決裂。因為孫中山向袁世凱讓步，喪失了一次試驗實行其思想的機會。第二節探討革命勢力與袁世凱的關係。革命勢力圖利用國會和臨時約法，藉以約束袁氏，但是由於袁世凱的權力並非源於民國政府、他遠離革命黨人的勢力範圍，以及國人當時的民主意識不高，因此革命勢力不僅未能控制袁世凱，反而受制於他。在二次革命前後，袁世凱殺害宋教仁、擅自問列強借款、解散國民黨、剝奪國民黨籍的議員資格、解散國會和省議會、停辦地方自治、引進步黨入內閣、破壞臨時約法、實行擴充總統權力的新約法。作者對革命黨人的做法不以為然，表示「至於與舊勢力妥協，而圖襲西方民主制度的若干形式，一蹴而躋於共和，則其無成，已是既明的事實。」（頁 188）

第三節進一步論述向袁世凱妥協所帶來的影響，分別是開武人跋扈恣睢之局、政治道德的陵夷、蓬勃奮發的民氣消融腐化，還有革命勢力的分裂。民國建立初期，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護法運動先後發生，孫中山惟有以恢復臨時約法和舊國會為號召，藉此聯合實力派系，與北洋軍閥、舊官僚勢力互相周旋。作者分析孫中山表彰約法和國會的原因：（一）約法和國會是民國法理的「正統」，對於破壞約法和國會的北洋武人官僚，要求恢復「正統」自然是一個最容易結合各方勢力的理由；（二）民國開國以來，擾亂未已，民心厭亂，孫中山為爭取民心，只能夠適可而止，儘早恢復國家的和平和秩序；（三）民生主義的建設祇能實現於一個民主社會之中，所以任何政府形式，凡有裨於民主政治的，都值得支持；（四）孫中山感覺完全實現他的理想的時機未至，所以他一面強化他的黨的組織，而對外則揭最合乎法理和最可能收眾望的宗旨，以為號召。

民初有一段時間，孫中山專注於民生經設建設。第四節論述民初時期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其內容特色包括：重視實業、推崇社會主義尤其是國家社會主義、提倡平均地權、推動鐵路建設、主張運用外資和實行門戶開放主義。當時孫中山在民生主義方面最重要著作首推《實業計劃》。作者介紹該書內容，就是「計分六計劃，從事十項建設，即（一）開發交通；（二）開闢商港；（三）興建都市；（四）發展水力；（五）振興工業；（六）發展礦業；（七）發展農

業；（八）興水利；（九）造森林和（十）移民實邊。第一至第三計劃各以一世界港的開築或改良為中心；第四計劃為鐵路；第五計劃為食、衣、住、行、印刷工業；第六計劃為礦業。」（頁 234）推行實業計劃的好處是吸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因戰爭終止而過剩的物資，幫助消弭戰後的經濟危機。此外，促進中國現代化發展，並增加國家的資本數量，而中國現代化成功為世界提供一個龐大的市場。作者認為孫中山從《實業計劃》中，顯現「一種非凡的把握知識的能力——使複雜繁殊的知識體系化的能力」，還有「對於戰後問題的一種深識遠見。」（頁 234）同時亦表現了科學的精神。有人批評孫中山是「空論家」、「理想家」，作者反駁這些批評，以梁士詒的言論、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法幣政策為例，指出孫中山主張建設二十萬方里鐵路和「廢金錢、行鈔券」的「錢幣革命」論，是切實可行的。作者更進而認為「至民國八年（1919 年）止，中國還沒有一種力量，足以當社會主義之稱，與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分庭抗禮。」（頁 240）

孫中山的政治思想是第五節的探討主題。1914 年，孫中山在日本成立中華革命黨，鑑於二次革命期間「黨事之不統一，負責之無人」，因此孫中山在成立中華革命黨時主張「統一事權，服從命令」。同時將「革命方略」的「約法之治」易稱為「訓政」，加強總理統一黨務的權力，並把「五權並立」明列為黨的組織的一部。不久中華革命黨變回國民黨，而國民黨積極收容各派。從中華革命黨到國民黨，孫中山堅持黨權，強調革命黨是民國的根本。該節也論述孫中山的五權憲法和地方自治思想。五權憲法思想方面，作者指出孫中山的權能區分學說在中華革命黨時期已經出現。地方自治思想方面，作者藉比較同盟會的《革命方略》和宋教仁的《大政見》，揭示孫中山的地方自治思想特色，就是地方自治旨在推動憲政和民權建設、以縣為地方自治的單位。至於地方自治內容，地方上的每一個縣有縣議會和縣長，縣長以下有六個局。人民有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和複決權，而縣長備有否認權。1917 年，孫中山發表《民權初步》一書，進一步宣傳地方自治思想。作者也將官僚政客和地方士紳的地方自治，還有聯省自治運動，與孫中山的地方自治互相比較。

繼政治思想後，作者在第六節討論孫中山的外交思想。首先，在民國成立初期，孫中山要求列強重訂海關稅則，取消治外法權，歸還租界，並主張開放中國各地通商，利用外資開發中國資源和進行鐵路建設。然而這些要求和主張沒有實現。此外，亦探討孫中山對俄國、英國、美國和日本的看法。俄國方面，由於庚子拳變後帝俄出兵中國東北拒不撤退、它與日本劃分兩國在滿蒙的勢力範圍，還有辛亥革命後煽動外蒙古脫離中國，因此孫中山對帝俄充滿戒心。俄國爆發革命，帝俄被推翻，新政府對中國、孫中山表現友善，使孫中山對俄國的態度產生變化，萌生聯俄的想法。英國方面，孫中山認為英國會犧牲中國以餌他國。巴黎和會中英國支持日本享有山東利益，證實了孫中山的看法。美國和日本方面，孫中山主張中、日、美三國協力互助，不過反對完全依賴美國。在 1919 年前，孫中山一直有聯日的想法，藉此清除舊軍閥和舊官僚。作者肯定孫中山的想法，表示「中山先生的聯日政策，在消極的意義上，是要孤袁氏和北洋武人之援，而在積極的意義上，更要以日本有識者和中國民黨的提攜，使日本的進步勢力在國內『益得信用』，以防野心家的得勢。這是他眼光的遠大處。」（頁 292）但是日本政府拒絕援助孫中山，最終孫中山放棄聯日的希望。帝俄侵略外蒙、日本提出《二十一條》、列強在巴黎和會壓迫中國，加上美國威爾遜總統提倡「民族自決」，刺激孫中山揭櫫「積極民族主義」旗幟，以代替五族共和理論，同時以漢族為主體同化國內其他各族，而同治過程是自發的、和平的，絕不假手於武力或強迫。

最後是第七節。1918、1919 年孫中山埋首研究，撰寫了《孫文學說》與《民權初步》兩部著作，它們與《實業計劃》合稱《建國方略》，而《建國方略》與《三民主義》講演是孫中山畢生著作中最富有建設性。孫中山在《孫文學說》強調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知難行易、有志竟成，還有先知先覺者、後知後覺者、良知、創制和宣誓的重要性。1919 年五四運動爆發，將新文化運動發展推上高峯，該運動的策源地是北京大學，主張白話文和科學、積極輸入世界新文化、提倡思想自由、徹底檢討舊制度和舊思想，以至從政治、社會、文化方面探索國家的建設和改造。新文化運動刺激孫中山創辦上海民智書局和《建設》雜誌，藉以灌輸學識。作者亦探討孫中山的性格，指出他樂觀進取、相信人定勝天，並且是一個進化論者，承認世界充滿生存競爭，人知是進化過程中的一個決定的因素。

王德昭教授在香港執教大學十多年間，桃李滿門，他的學生闡明《孫中山政治思想研究》一書的價值和影響，他們分別表示「德昭師一九六二年出版的《國父革命思想研究》是一本博大精深之作。此書取精用宏，不僅系統而深入地論述了孫中山的革命活動及其思想發展的歷程，更值得注意的，書內剖析了孫中山革命思想中繼承於傳統，吸收自西方和出於自己創造的三個思想來源，追本溯源，深切著明」（陳萬雄語）、「把孫中山的思想與事功放在近代中國的大歷史背景下考察，解答了孫中山三民主義為何能超越群倫，為何能從芸芸的革命志士中脫穎而出成為革命黨人共認的領袖，以致成為中華民國國父真正的歷史原因」（林啟彥語）、「記得我在大學三年級修習王德昭教授的近代中國思想史時，反覆鑽研老師所著《國父革命思想研究》一書，幾近十遍之多，每次都有新的收穫。後來撰寫碩士論文《蘇報與清末政治思潮》，多少是在這一基礎上發展出來的；甚至到了準備博士論文時，還把此書重讀一遍」（周佳榮語）。由此可見，出版社重印這本距今接近半個世紀的著作，顯示其獨到的眼光。

然而在重印過程中，出現了美中不足的地方。首先，本書集中探討一九一九年前孫中山的思想，事實上作者對晚年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和民族主義也進行了研究。《從改革到革命》一書於一九八七年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收錄了王德昭教授在近代中國史研究的九篇論文，其中三篇是關於孫中山的思想，分別是〈五四運動對於孫中山革命思想之影響〉、〈第一次聯俄聯共對於孫中山革命思想的影響〉和〈孫中山民族主義思想的最後發展〉。若本書重版的時候，同時收載這些論文，可以使讀者全面了解孫中山一生的政治思想。此外，本書有若干手民之誤，例如「這次舉的失敗」（頁 7）、「尤列」（頁 8）、「萱野長知」（頁 9）、「合黨之志在搶掠」（頁 10）、「秦西諸邦」（頁 28）、「鍥而捨」（頁 46）、「革命方格」（頁 66）、「領導國家庭設」（頁 252）、「李完用」（頁 288），似乎應該是「這次舉兵的失敗」或「這次義舉的失敗」、「尤列」、「萱野長知」、「會黨之志在搶掠」、「泰西諸邦」、「鍥而不捨」、「革命方略」、「領導國家建設」、「李克用」。手民之誤出現原因可能如陳萬雄在〈導讀〉所說「囿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的時艱和書業運作的落後」。（頁 ii）其實出版社正好利用本書重印的機會，將這些錯誤更正，希望日後該書再次翻印時，手民之誤次數會有所減少。

《當代史學》第11卷第3期（2012年9月）

❖ 書　評 ❖

王尊旺、李穎著《醫療、慈善與明清福建社會》評介

廖懷恩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

書　　名：醫療、慈善與明清福建社會
作　　者：王尊旺、李穎
出 版 地：天津
出版機構：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0
頁　　數：269

本書是《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叢書》二十種之一，由福建中醫藥大學公共管理系講師王尊旺和福建省閩江學院歷史系副教授李穎合著。在上古時代，福建為越人居住之地，其後秦始皇南平百越，置閩中郡。在明代，福建受倭寇襲擾，朝廷宣佈海禁，令福建對外的海上貿易受阻，但無損其社會和經濟方面的發展，醫療和慈善事業亦非常發達。至清代，福建省內的福州是與琉球國貿易的規定口岸，亦是清廷於鴉片戰爭中戰敗，而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所指定的五個通商口岸之一，歐美的傳教士和西醫隨著商船前來傳教和行醫，同時致力於慈善工作，令福建社會的各方面產生了積極的變化和進步。全書共有四章，內容如下：

第一章〈醫學、慈善與明代福建社會〉，敘述明代福建的醫療機構及其社會活動、養濟院的發展、瘟疫和社會的應對。明太祖朱元璋於洪武三年於朝廷置「惠民藥局」，府設「提領」，州縣設「官醫」，又於洪武十七年規定各府州縣設「醫學」，作為醫療行政管理機構。明太祖出身貧苦，所以非常關心平民百姓，於洪武五年詔各郡縣置孤老院，後改名養濟院，使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福建一地潮濕炎熱，是瘟疫的溫床，以武宗正德和世宗嘉靖兩朝發生瘟疫的次數最多，共七十二次。每遇瘟疫發生，朝廷必派欽差指導救疫和賑濟的工作，甚至減免賦稅，而百姓則訴諸鬼神。福建人認為瘟疫的發生是由於鬼神作怪，所以要祭祀鬼神，不能求醫，求醫者必死，此種愚昧的信仰令福建一地每遇瘟疫都死者甚眾。

第二章〈清代福建的醫療與慈善〉，闡析清代福建養濟院的發展和變遷、福建的瘟疫和社會的互動、福建育嬰堂的運作與民間社會殺死初生女嬰的傳統。在清代，全國各地都設有養濟院。至清朝末期，隨著朝廷力量的式微和民間力量的崛起，地方的善長人翁自發地經營養濟院。此外，福建各地都設有痲瘋院，專收痲瘋病人。清代的福建和明代一樣時有瘟疫發生，鴉片戰爭後通商口岸的開放更帶來了外地傳入的瘟疫。書中引述周秋光、曾桂林合著《中國

慈善簡史》所言：「清代是我國歷史上溺女問題最嚴重的時期，同時由於統治者和地方士紳的重視，清代也成為繼兩宋之後育嬰事業最為興盛的時期。」基於重男輕女的不正常觀念，中國古代各地都有初生女嬰被殺的慘劇發生，福建人嫁女更加要「賠」豐厚的嫁妝。作者怒斥這種殺害親生骨肉的冷血行為，並詳盡地記錄了福建人扼死和溺殺女嬰的惡行，足見其對女嬰被殺問題的高度重視。殺死女嬰的兇手多為女嬰父母的家人或接生婆，有時甚至是女嬰的母親，當然也要女嬰父親的首肯。

扼死或溺殺女嬰之事在今時今日的中國農村仍然存在，部份居於城市的父母以超聲波檢查得知嬰兒性別後會把女嬰打掉，這是中國人眾多不文明行為之中最不文明一種，必須廢止。無論男嬰或女嬰都是靠女人懷孕然後生產下來，孕育和哺養嬰兒的工作也是靠女人做的，懷孕的不適和生產的痛苦都是由女人來承受，男人所付出的只不過是一點兒時間和幾億個活細胞，女人在繁殖後代的工作絕對比男人更為重要，所以「重男輕女」此一只在人類社會中存在的觀念實在是絕不合理的。歐美國家很早已經實現真正意義的男女平等，無論在法律上、社會上和思想上皆是。中國的男女雖然也在法律上和社會上平等，但只是名義上的，在思想上還有根深蒂固的重男輕女觀念。中國想要成為真正的大國，就必須實現思想上的男女平等。

第三章〈西醫入閩與晚清福建社會〉，探討晚清福建的西醫發展、來閩西方人的中醫觀和福建社會對西醫看法的轉變，並記述了福建第一位女西醫許金訇的一生及其貢獻。福州和廈門因為《南京條約》的簽訂而成為對外通商口岸，來自西方的傳教士和醫生在當地創立了大量醫院和診所。中國病人被西醫治好後必然對西醫產生信任。相反，來閩西方人普遍認為中醫只能算是「技術」，而非「科學」，雖然中藥對某些疾病確實有一定療效，但中醫師的質素沒有保證，中醫的理論中亦存在不少「不科學」的成份，外科手術和細菌病毒學更是中醫最弱的一環。西醫最注重衛生標準，針筒用完即棄，手術工具要徹底消毒，但針灸所用的針卻伴隨中醫師一生，刺完一位病人再刺下一位，中間只會以火烘一烘針頭就當是消了毒。西醫院有無菌手術室，中醫館卻沒有。西醫醫院的先進醫療和手術設備，西醫生的專業資格保證和系統科學的醫療知識都是中醫所沒有的。西醫愈來愈受華人所信任，晚清更掀起了華人留學歐美學習西醫的熱潮。許金訇是福建第一位女西醫，作者指出學術界多將她的姓名誤譯為「何金英」，「許金訇」才是正確，她於 1884 年遠赴美國學醫，畢業於費城女子醫科大學，在 1895 年回到福州，於 1898 接管媧氏紀念醫院，廢寢忘餐地醫治病人，並積極培養醫護人員，宣傳公共衛生，深受市民愛戴。許金訇年幼時曾受扭曲病態美的荼毒，趁父親外出的一天將自己雙腳纏起來，父親回來看到後耐心地向她解釋纏足的弊處，於是金訇就決定放棄纏足了，長大後更成立了反纏足協會。

在第四章〈結語與思考〉中，作者指出中國傳統的保息事業在強週慈善的同時，更具有保持社會穩定和社會控制的內涵，伴隨著時代的巨變、社會由傳統向近代的變遷和鄉紳階層的崛起，明清時期的社會慈善事業體現出較為複雜的歷史特質，這正是本書的主旨。此外，作者又特別指出有論者在討論有關醫學和現代化的問題時，往往過多地強調國人觀念的變遷和對西醫的接受，以證明近代中國處於不斷的現代化之中，事實上中國人雖然接受西醫，卻沒有拋棄傳統，雖然西醫在防治瘟疫上有很強的療效，但根據大量史料的記載，求神拜佛依然是多數人的第一選擇。總括而言，本書主旨清晰，內容實在，更引用了大量原始史料，是一本很有學術價值的專著，能幫助讀者了解明清時期的福建社會、醫療慈善事業和醫藥文化。

《當代史學》第11卷第3期（2012年9月）

❖ 學界動態 ❖

「辛亥革命百年：孫中山、近代中國與海外華人」國際學術研討會紀要

區志堅
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

2011 年，為紀念辛亥革命百周年的重要年份，中國及海外各地均舉辦各種有關辛亥百年的學術研討會、論壇、展覽會、戲劇及有關辛亥課題的比賽等活動，尤以學術研討會更為重要，當中不少學者交流最新的研究成果，更新知識，研究成果可作為日後人們吸收知識的重要媒介，更藉展覽會及比賽，使研究成果得以普及民間。而且，辛亥革命結束了中華帝國管治模式，國家走向共和體制，社會、經濟、學術文化發生了改變，中國也成為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促成辛亥革命的成效，與馬來西亞及星加坡等東南亞華僑的資助甚有關係，馬來西亞的檳榔嶼一度成為「廣州起義」(又稱「黃花崗起義」)的策劃地，孫中山與一群志士曾在此地召開歷史上所稱「庇能會議」，中山在檳城向華僑籌款，宣傳革命思想，招募華僑志士往廣州參加起義，依近人考證參加是次起義的，約有 29 人是來自新加坡、馬來亞、越南、印尼等南洋地區，當中 4 位來自檳城，分別為羅仲霍、周華、李雁南、陳文褒，雖然廣州起義未獲全功，卻促成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義，中山更說：「第一次革命，雖由武昌起義，而實廣東三月廿九日之役為先」，可見為武昌起義打下根基的，就是三月廿九日起事，而促成廣州起事又是馬來西亞庇能會議，故武昌起義與馬來西亞華僑之支持，甚有關係；加之，1905 年，檳城及喬治城內的柑仔園、小蘭亭俱樂部、閱書報社、平章堂均與革命事業有關，中山曾將妻妾盧慕貞、陳粹芬、兩位女兒接到檳城，當地也是中山為革命奔波得以與家人團聚的重要地方；還有，中山的革命事業又受到檳城富商吳世榮、黃金慶及陳新政的鼎力資助，世榮曾任「南洋同盟會」主席，傾蕩家產為革命，馬來西亞與孫中山及其革命事業甚有淵源，故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華研究中心特於 2011 年 7 月 2 日至 3 日，假座校園舉辦「辛亥革命百年：孫中山、近代中國與海外華人」國際學術研討會，又與檳城孫中山協會合辦「孫中山歷史圖片展」，會後更帶領予會者參觀中山在檳城活動地方，如檳城閱書報社（The Penang Philomathic Union）及檳城會議基地等遺址，檳城會議基地即為當年中山舉行庇能會議的地方。是次研討會，在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院長何啟良教授致獻詞後，正式開始。現把是次研討會上宣讀論文內容，報告如下，使海內外學者了解是次研討會的情況。

顧長永(國立中山大學亞太研究所)發表〈辛亥革命百年的歷史意義〉一文。顧氏也為是次研討會專題演講嘉賓。他在論文中，指出中山主張的建國發展階段論，闡明軍政時期、訓政時期、憲政時期國家發展的方向，文中更從當代中國政治變遷、大東亞國家的情貌，從宏觀及全球化的視角，討論中山思想的歷史意義。

徐國利（安徽大學歷史系）發表〈是民生史觀？還是民本史觀？——對孫中山歷史觀本質屬性的新審視〉一文。作者指出不少學者認為中山的社會歷史觀為民生史觀，但他指出中山從未明確稱其歷史觀為民生史觀，把中山歷史觀概括為民生史觀，難以涵蓋三民主義包涵的內容及特性，進一步指出民本思想才是中山歷史觀的核心，中山歷史觀就是建立在民本思想基礎上的「民本史觀」，此觀念也是中山繼承儒家傳統民本思想及大同學說，吸取西方進化論及社會主義的成果。

陳學然（香港城市大學中文、翻譯及語言學系）在〈庚子年孫中山與各派的互動及其事業〉一文，以庚子拳變為時代背景，考察革命黨為代表的孫中山，保皇會為代表的康有為、梁啟超，及代表朝廷外臣的李鴻章，三者的心情及其互動關係，並指出中山藉拳變以攻擊清廷，樹立新的形象，宣傳革命思想。

區志堅（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在〈非黨派與黨派相異之處：以錢穆、戴季陶及陳伯達闡述孫中山的思想為例〉一文中，以錢穆為非黨派的代表，戴氏及其《三民主義之哲學的基礎》為國民黨言論之代表，陳氏及其《三民主義概論》代表了中國共產黨觀點，藉檢視三者詮釋中山思想之別，以見屬黨派者自以中山思想肯定其黨派理論的合法地位，屬非黨派者則重拾中山思想以「指導」國共雙方的施政。

湯熙勇（臺灣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發表〈美國華人對辛亥革命爆發與民國成立的反應：以舊金山《中西日報》報導為中心〉一文。湯氏指出《中西日報》為舊金山最主要的華文報紙，刊載不少華人、中國和美國事務的訊息，華人透過《中西日報》報導及評論，掌握辛亥革命後中國國情；文中也指出此報章刊載了不少舊金山華商總會及會館等人士，多捐款給新成立國民政府，推動革命事業，當然此報刊也載有不少華僑不滿捐款的言論。

吳龍雲（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所海華組）在〈際遇不明與功成身退：民國後檳城閱書社及其成員〉一文中，指出同盟會、閱書社及中華革命黨三者的關係是不可分，檳城除了是策劃黃花崗起義的要地外，當地閱書社成員在中山不容於各地政府，及同盟會內部分裂時，仍支持中山為首的革命社團，又為中山提供一個暫居及構思的地方，但民國成立後，閱書報社成員因中國情勢未如所期，革命事業也出現轉折，遂多轉往從事地方教育事業，為檳城華人社會的安穩及推動社會事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安煥然（南方學院中文系）發表〈柔佛「治華政策」及柔佛革命志士〉一文。安氏一文中指出辛亥革命前夕，中山革命勢力在柔佛的擴張相當艱辛，此又與柔佛王國的基本國策及治華政策有關，其中廣東台山籍黃吉辰等人均是同盟會成員，部份志士在麻坡成立啟知書報社，在峇株巴轄成立益群書報社，此對推動文化教育及傳播革命訊息，甚有影響；在革命後，柔佛新式華校的倡辦，又多為同盟會成員，可見華人教育事業與革命派的關係。

陳中和（臺灣文藻外語學院應用華語學系）在〈反帝國主義論述的建構：談孫中山醫生與馬哈迪醫生的亞洲觀點〉一文中，認為中山的救國途徑非全盤西化，而是把西方政治理論結合中國社會傳統，加以實踐，以拯救在西方帝國主義下亞洲國家為己任，為亞洲第一位建立反帝國主義論述的國家領袖；而馬來西亞第一位平民首相馬哈迪，如中山一樣是醫生，也

是追求救國濟民的民族主義者，他反對西方霸權，把西方政治理想加以修訂，轉換為適合馬來西亞國情的政治體制，故作者比較中山與馬哈迪治國觀點，並闡發二氏均以有限度地抵制自由市場經濟，合理化若干威權制度，聲援亞洲弱小國家，鞏固民族資本的觀點，也論述二氏在亞洲政治發展史上的差別地位。

黃文斌（拉曼大學中文系）在〈現代中國思想家：錢穆論孫中山〉一文中，檢閱錢穆全部著作，提出錢氏認為中山是近代或現代中國唯一的思想家之原因。因中山能夠融會舊傳統，開創新局面，又持批判的角度接受西方思想；在錢氏看來，只有中山才是繼承及改良中國傳統文化，也不是全襲西方文化的重要思想家，而錢穆闡述中山思想的觀點，可以作為處理當代中國發展的藍圖。

張曉威（拉曼大學中文系）在〈清季駐檳榔嶼副領事對辛亥革命的影響〉一文中，指出 1906 年後，中山及革命黨領袖，不僅以檳榔為僑居地，也在當地成立同開會分會，策動革命事業，更要說明無論是「倒孫運動」的影響，清廷政府的打壓，英屬殖民地政府對革命黨的態度等外在因素，使中山不得不慎重考慮把南洋革命重心從新加坡遷往檳榔嶼外，更重要的是清政府派駐檳榔嶼的副領事，對革命黨的態度與駐新加坡領事不同，此促使了檳榔嶼在晚期革命事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鄭文泉（拉曼大學中文系）在〈辛亥革命與近代馬、新朱子學的沒落〉一文中，探討 1901 年後，清廷及維新派設法在馬來西亞的新式教育體制下，保存朱子學為修身及讀經的課程，並從孔教復興運動中，以孔學代替朱學，而革命派在當地更徹底地去朱學為傳統中國文化的地位，取消學校的修身及讀經二科，這樣二者均導致革命後朱子學在馬新二地日漸衰落的重要原因。

總之，是次研討會之特色是多方面的：一，是次研討會為來自華人地區的不同學者，如中國大陸、香港，臺灣及馬來西亞學者；二，學者提出新的研究觀點及方法，除了注意整理文獻外，也要注意從哲學、傳播學、社會學及語言學的角度，闡發辛亥革命的意義；三，注意本土對辛亥革命的回應；四，注意從宏觀的角度，從亞洲視野，從世界史的角度，闡發辛亥革命的重要地位；五，與會學者提出在革命史觀影響下，應重新檢視維新派，海外華僑對革命一事的觀點；六，仍要整理更多辛亥史料，特別是海外華人地區尚要發掘更多新資料，並要求打破語文的阻隔，閱讀當地文獻，參與華人的生活，以生活引證辛亥時海外華人所思所想，這樣更能闡發「與古人同遊」的治史方法。其中以第三點，尤為重要，予會者認同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很多學者注意海外華人的研究，但近年對此課題尚未多加提倡，故希望更多學者研究此課題，學者一再呼喚應建立「百年辛亥，百年華僑」的研究領域，希望從清末民初的「海外華人」帶到「本地華人」的研究，在「中國史觀」下，要多注意不同地區，不同群體的回應，為甚麼部份地區的華僑會認同革命，又有部份地區人士是不滿中山；在南洋的殖民地政府為甚麼對中山及其革命事業，有不同的反響，故學者要「從當地出發」檢視孫中山推動革命事業的困難及革命的意義。這些觀點，與當今學界提倡在全球化研究下，要注意保留區域化特色之觀點，相為呼應。

❖ 學界動態 ❖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活動匯報
（2011 年下半年至 2012 年上半年）

■ **香港浸會大學入學資訊日**

香港浸會大學本年度的入學資訊日於 2011 年 10 月 15 日至 16 日舉行，歷史系的學系講座除了三年制和四年制的課程介紹之外，還編印了多塊展板。兩天有數百位來自港九新界多間學校的師生參加了活動。

■ **「中國與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與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主辦，外交學院（北京）香港浸會大學林思齊東西學術交流研究所協辦的「中國與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2011 年 11 月 17 日在樹仁大學舉行，18 日在浸會大學舉行，逾百位來自美國、日本、中國內地、台灣、澳門和香港的專家學者參加了會議，在會上提交和宣讀的中、英文論文有六十多篇。浸大歷史系的麥勁生教授在會上致詞，林啟彥教授和李金強教授主持了分組討論，本系師生在研討會上宣讀的論文計有：

- 周佳榮「日本人與香港報業」
- 范永聰「宋代性理學在朝鮮半島的傳承與發揚——以權近的思想為討論中心」
- 麥勁生「20 世紀初跨國華人政治群體的出現」
- 羅婉嫻「從 1910 年中國東北鼠疫探討中國與世界」
- 譚家齊「進退兩難：從十七世紀中國沿海擱淺船隻之遭遇看東亞海洋貿易的風險」
- Dr. Bettina Dietz “Collecting and Displaying Chinese Porcelain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 丁　潔「從港澳到海外——《華僑日報》及其聯營報紙」
- 區顯鋒「晚清知識分子對外認識：以王錫祺輯《小方壺輿地叢鈔》為考察線索」
- Miss Ng Yee Ching(吳綺靜小姐)“Policing the Colony: Indians in the Hong Kong Police Force”

■ **公開講座**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舉辦的公開講座，2011 年 11 月 21 日邀請李伯重教授主講「我的治學歷程」，講座在查濟民科學大樓 LT1 舉行；2011 年 12 月 16 日邀請 Professor Ronnie Po-chia

Hsia 主講「Western and Chinese Language Sources for the Biography of Matteo Ricci」，講座在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會議室舉行；2012 年 3 月 29 日舉行「近代中國基督教史講座第 33 講」，邀請侯杰教授主講，講題為「基督教青年會與近代中國」，講座在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會議室舉行；2012 年 4 月 16 日邀請何偉傑博士主講「傳統與西化之間：澳門飲食文化漫談」，講座在永隆銀行商學大樓 WLB104 舉行；2012 年 4 月 18 日邀請陶傑先生主講「魏晉清談與竹林七賢」，講座於永隆銀行商學大樓 WLB303 進行。

■ **「旺角街坊會口述歷史計劃」研討會**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與旺角街坊會主辦，社會福利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福利辦事處、教育局油尖及旺角區學校發展組協辦的「旺角街坊會口述歷史計劃」研討會，2011 年 12 月 5 日在香港浸會大學逸夫行政樓會議廳舉行，共有兩間中學參與這項計劃。

■ **「孫中山與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

由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以及孫中山福利基金會合辦的「孫中山與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於 2012 年 6 月 9 日在香港浸會大學逸夫行政樓 SWT501 舉行。二十多位來自香港、澳門、中國內地及台灣的專家學者參與會議，並發表多篇學術論文。本系教職員在研討會上宣讀的論文計有：

- 周佳榮「孫中山與滬港醫師」
- 林啟彥「孫中山與宮崎寅藏」
- 李金強「孫中山與何啟」
- 文兆堅「一九八零年代以來香港和澳門的孫中山研究」

■ **「伊利沙伯醫院五十周年口述歷史計劃」研討會**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與伊利沙伯醫院合辦的「伊利沙伯醫院五十周年口述歷史計劃」研討會，2012 年 6 月 28 日在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大樓 SCM012 舉行，共有兩間中學參加是次會議。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資料室）

❖ 學界動態 ❖

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活動匯報
（2011 年下半年至 2012 年上半年）

■ 「中國文化轉變與傳承」講座

2011 年的「中國文化轉變與傳承」講座有兩個主題：（一）家族倫理與中國社會，范永聰博士主持，由侯勵英博士（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講「同心一體：香港新界傳統村落生活中的倫理文化」；（二）醫藥衛生與生活文化，周佳榮教授主持，由羅婉嫻博士（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主講「中國預防天花的演變：從人痘到牛痘」。

■ 第七屆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討會

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合辦，中國基督教史學會協辦的第七屆「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討會」，2011 年 6 月 10 日及 11 日在香港浸會大學舉行，本屆研討會的主題是「基督教區域研究」，在會上提交和宣讀的中、英文論文有五十多篇，逾百位中外學者參加了會議。

■ 中國現代史專題講座

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與當代中國研究碩士課程合辦的「中國現代史專題講座」，2011 年 10 月 11 日在浸大基督教教育中心舉行，由彭淑敏博士（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主講「孫中山在港活動（1883–1892）：介紹孫中山史蹟徑主要參觀點」。

■ 「中國教育家與香港」講座

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與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主辦、中業育才教育機構贊助的「中國教育家與香港」講座系列之一，主題是「陶行知和他同時代的教育家——從實用主義到平民主義」，2011 年 10 月 18 日在浸大逸夫行政樓會議廳舉行，內容包括兩個講題：其一是「蔡元培與陶行知：兩大平民教育家的交遊」，侯勵英博士（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講；其二是「陶行知與晏陽初：實用主義教育思想的試驗」，周佳榮教授（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主講。

■ 「人文講堂」公開講座

由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歷史研究中心，以及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合辦的「人文講堂」公開講座，於 2012 年初共舉行了五次演講：

講　者	講　題	講座日期
黃佩賢博士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漢墓壁畫的歷史意義	2012 年 1 月 4 日
黎明釗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五瑞兆豐年——東漢《西狹頌》的《五瑞圖》	2012 年 1 月 11 日
張偉國博士 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	明初東亞地圖中之世界及歐洲	2012 年 1 月 18 日
譚家齊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電子地圖與地方史研究——以明清時期松江府為例	2012 年 2 月 1 日
范家偉博士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1950 年代中國的血吸蟲病防治運動	2012 年 2 月 4 日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資料室）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Department of History,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
Department of History -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主辦

外交學院（北京）　香港浸會大學林思齊東西學術交流研究所　協辦

歡迎參加

第1日議程　2011年11月17日（星期四）

時間　上午9時30分至下午7時15分
地點　香港樹仁大學圖書館大樓C樓會議廳

主題演講　張國剛教授（北京 清華大學歷史系）
潘光哲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第2日議程　2011年11月18日（星期五）

時間　上午9時30分至下6時30分
地點　香港浸會大學
陳瑞槐夫人胡尹桂女士持續教育大樓12樓

主題演講　汪榮祖教授（中央大學人文研究中心）
林滿紅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電話：3411 7107
電郵：hist@hkbu.edu.hk

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
電話：2104 8271
電郵：whkwok@hksyu.edu

當代史學

第 11 卷第 3 期　　2012 年 9 月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Review

Vol. 11　No. 3

September 2012

43

網址 Web Site: http://histweb.hkbu.edu.hk/

香港 · Hong Kong

編印：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
及近代史研究中心
地址：香港九龍塘
電話：(852) 3411 7107
傳真：(852) 3411 7885
電郵：hist@hkbu.edu.hk

Compiled and Published by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Modern History Research Centr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Kowloon Tong, Hong Kong
Tel: (852) 3411 7107
Fax: (852) 3411 7885
E-mail: hist@hkbu.edu.hk

網址 / Web Site: http://histweb.hkbu.edu.hk/

編 輯 委 員 會（Editorial Board）

主編：	周佳榮	Chief Editor:	CHOW Kai Wing
執行編輯：	范永聰	Editor:	FAN Wing Chung
助理編輯：	陳月媚	Assistant Editor:	Renee Y. M. CHAN
高級研究助理：	梁嘉寶	Senior Research Assistant:	Coco K. P. LEUNG
編輯助理：	潘家瑩	Editorial Assistant:	POON Ka Ying

本刊內的論著，乃表示作者的個人觀點或研究發現，並不一定代表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系方的意見。

The articles in this Journal record the personal views or research findings of the contributors and do not necessarily express the official views of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轉載或節錄文章，須得作者書面同意。）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author.

【 非賣品 Not for sale 】